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10月31日第24期 总第202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202期

##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十三）

### 中国人民大学专辑（上）

#### 目录

##### 【道歉】

许景禹 我要回母校向校长和老师当面道歉  
——回忆在人大的文革历史

##### 【怀人】

顾 土 母亲啊，你一生写过多少交代  
项 威 寸草心犹在，不忘慈父情  
——在五七干校，父亲仰药自尽

##### 【述往】

李豫生 长矛刺入他的头颅7公分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  
——孤岛时期

林俊德 我在文革中是怎样闹革命的（上）

##### 【口述】

高 放 口述 右派许惠尔为何被打死  
高承宗 口述 我是怎样被毒打的

##### 【资料】

陆伟国 编写 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大事记

##### 【本刊声明】

【专稿】

## 我要回母校向校长和老师当面道歉

——回忆在人大的文革历史

许景禹

### 一、紧跟形势，宁左勿右



我是1964年以高于北大清华的录取分数，从吉林省考入人民大学的。建国后，反右倾，抓右派，反击右倾翻案风……始终都是左比右好。当时中国在国际上反帝反修，国内是学大寨、雷锋、王杰……

在高中时亲眼看到被下放到母校的一些大学右派教工的艰难，到人大后又看到了全国著名大右派吴景超、葛佩琦等被打压，女学生林希翎还在监狱服刑的处境……更深受触动。所

以立志要当个左派。

文革开始时，人大是围绕以保还是反校长郭影秋和校系领导而分成的两派。当时北京的红卫兵和后来的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等“五大领袖”“造反派”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我也要当造反派。

特别是中央文革的江青戚本禹都公开说，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三个副校长。而“新人大公社”是保郭和校系领导的，已经成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皇派。陈永贵也来人民大学题字支持“三红”。所以我选择加入了“人大三红”。

我在“三红”是人所共知的铁杆造反派。左到啥程度？甚至认为总部的二把手、比较温和稳重的刘庆库（现名刘梦溪）总是右倾，几次都想策动要用我们系的董东庆取代他。

左是害人的。极左，更只会给人民造成危害。



（在办公楼和大松树下的全班合影。后排左4作者，二排左2孙晓兰，前排右1辅导员陆建章，左2冯生雨）

## 二、相信阶级斗争，阶级立场分明

那时专讲阶级，竟有十几次“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是最大的政治。

我本来最敬仰“三朝元老”“中共四老”的人大首任校长吴玉章，还参加了他的告别追悼会。当知道吴老反对打倒刘少奇和郭影秋等，竟开始对吴老的“保守”反感，甚至还攻击其秘书王宗伯是个“大扒手”。

在“三红”一派的领导干部、校党委宣传部长朱真被“新人大”抓走后，我曾省下自己的饭票，给他的大女儿朱青鸟（现在美国定居）多次从食堂买最好的饭吃；后来朱真受刑招供“叛变”，我马上就与他们划清了界限。



许惠尔老师在学校大松树前被“三红”的人围殴抓走时，大声呼叫，他身强体壮，几个人都按不住，正巧我路过那，只因为他是对立一面的，就没让放了他，结果后来被打死了。

现在看来，把两派的斗争搞

(作者戴造反派人大三红袖标和徽章和军哥合影)成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群众斗群众，是绝对错误的。今后可千万决不能再乱搞阶级斗争和什么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了。

### 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那时最时髦的毛主席语录。

我和人大红卫兵的组建者刘平凡两人曾经用刀割破中指写下血书表决心要誓死忠于革命。我在任三红总部宣传部负责人兼台长时，吃住在“东方红广播台”。白天工作一天，深夜还要到“人大三红总部”参加核心组会议，研究作战部署和宣传重点，常年的日夜连续作战，直到最终累病。

在两派斗争激烈时，我在东风1楼住处写了一副对联激励自己和人大三红战士：生当忧患原应尔，死得成仁未足悲。我虽然没参加武斗队，不能亲自上阵，但平时我总是身先士卒，冒着被抓的危险，手持长矛在人大校门口把守、宣传；起早亲自到城里贴大字报，到闹市卖“人大三红”报、发传单。

我曾和值班的女播音员李艳琴一起，手持扎枪，守卫广播台防止对手来攻打抢占。

“三红”每天派一人到林园楼顶上，和对手用大弹弓互射砖石。有一次，被击中的人几乎从5层楼高的人字房顶上滚下来，差点“英勇牺牲”。



江青说“人大三红”保大特务孙泱时，我敢冒险当面顶撞她说：“三红”是造反的、没保。

为了能揪出大人物，使“三红”更有影响，在没有任何材料时，“人大三红”冒险支持贴最有权势最红的康生的大字报。

（作者接待到北京的初中老师桑树林一起在天安门合影）顺便指出：当年人大确实是“比北大清华校小神灵大，教工学生人少精英多”。例如“三红”的大字报全北京第一；“三红”广播台的大广播喇叭功能全市第一。我还曾为此自豪过。

实际上，在人民大学周围方圆十几里的居民，都被大广播喇叭昼夜不停地打派仗，严重干扰了睡眠和休息。

现在看来，这是何等的冲动、幼稚、甚至愚蠢啊。

#### 四、做了很多应该反思、检讨的事

1. 在不同观点辩论时，动手打了同班女同学孙晓兰，把她的衣服（那时候是很宝贵的）撕毁，致其痛哭。在本派同学毒打本班同学冯生雨时，虽因个人关系较好，没亲自动手，但也没有制止对他的伤害。

2. 批斗会时，我用脚狠踹当时和自己观点不同的系副主任、后来的人大校长黄达，辅导员李金轩老师等10多人。



3. 我参与了两派互相搞揪阶级敌人的竞赛，结果是新闻系教授蒋荫恩在被“三红”关押在南一楼15号，上吊自尽；法律系教授何思敬被新人大关押在北二楼，打成脑出血，死在积水潭医院（后来周总理批示查处）。



（“人大三红”东方红广播台在办公楼顶全体合影。后排左1作者，左2林育全老师，右3奚广庆老师，前右3女编辑老师，右2播音员李艳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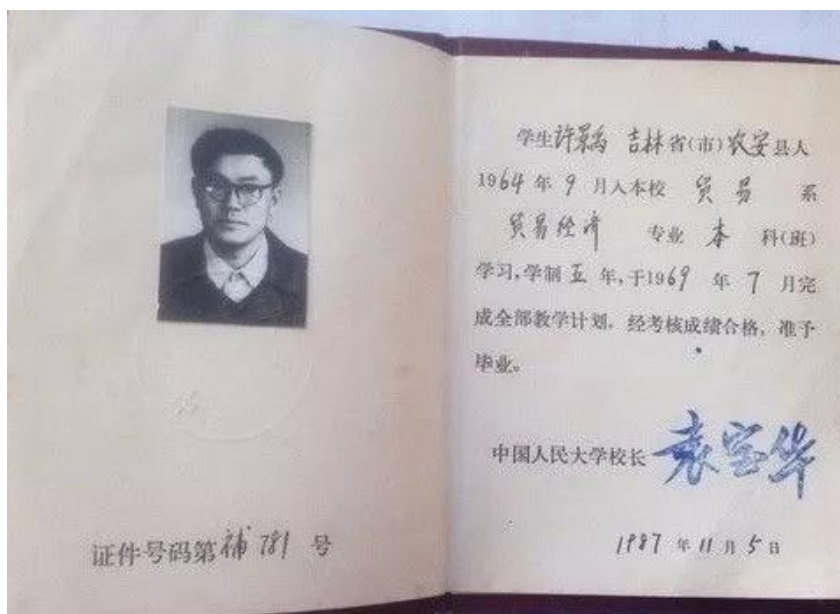
4. 大力宣传被“新人大”抓去遭到残酷毒打也宁死不屈的“三红”战士谭立清的事迹，给“三红”树立学习榜样，把不同意见者当成了敌我矛盾。

5. 双方大喇叭激烈对骂紧张气氛加剧升温。我甚至绕过编辑不用播音员，直播“可怜的哀鸣”和对手互相攻击。

6. 极力宣传反动老保挑动武斗，深夜播红色暴力音乐“造反有理”“不怕牺牲”……

1968年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是夺取占领红楼。5月11日，“三红”突袭能制造武斗器械的校办工厂，语文系王锡中同学惨死；总部二把手刘庆库给广播台亲自写的评论稿；广播台仍然鼓励武斗。

5月22日的武斗升级，造成5名人大校友死亡。计统系陈荣组农经系廖金妹（和我个人关系较好）杨大志当场被刺死。经济系沈士根（校舞蹈队成员，我是郭沫若女儿郭平英任指挥的校乐队的）被长矛刺入大脑致瘫痪后痛苦地死亡。



5月23日“新人大”开追悼会，对王锡中的父亲代表家属的发言，我竟表示强烈不满。现在看来，当时实在是“革命”冲昏了头脑，完全缺乏同情心甚至已没了人性。

这次纪念80周年校庆，我要自费回母校向黄达校长

（1987年才获得补发的毕业证书）和李金轩老师当面道歉。要向在文革中被我伤害的校工师生诚恳的说一声对不起！■

作者简介：人民大学财贸系贸易经济专业1964级，1970年离校后回到吉林，曾任县物价局长，省物价局研究中心主任，省外办国际合作部主任。1988年去苏联搞国际经贸合作。



## 【怀人】

## 母亲啊，你一生写过多少交代

顾 土



(母亲潘嘉)

先父陈兆祜是档案学者，将一生都献给了档案教育事业。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还发现了他生前为先母所建的档案，其中有1952年11月到1954年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毕业证书，有1981年4月16日追悼会的悼词；还有一身极其珍贵的粗布军装，母亲曾经穿着这套军装，1949年4月随大军渡江，5月进入上海。但是，保存最多也最令我震惊的却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到文革期间先母所写下的一篇篇交代

的底稿，以及先父亲笔抄录的1975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和1978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对先母“历史问题”所作出的审查意见与审查结论。

这令我想起上个世纪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清理、销毁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保留在人事档案里的所谓黑材料，尽管都是整人和被整的记录，显示出每个人身上的各类“污点”，但我父亲却认为这些材料同时也是一段历史时期里形成的真实记录，作为档案本身而言，并非伪造，同样具有历史价值，应该继续留存、妥善保护，让后人永远了解、铭记那个时代。为此他特意致信人民日报，从档案保存的角度，阐释自己的见解，人民日报将信发表在“内参”上。但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将先母交代文字的底稿也保存下来，使我在半个多世纪后得以面对这些凝结大量历史信息的沉重语言，一遍遍阅读熟悉的字迹，再次怀念早逝的母亲。

先母潘嘉，原名徐默文，江苏丹阳人，1927年5月12日出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不过20来岁，文革爆发那年，还不到40岁，可写交代却伴随了她的人生。

先母一生究竟写过多少交代，不得而知。但仅翻阅现有的这些交代底稿，就已令我心头格外压抑，因为母亲所交代的竟然都是8岁到21岁之间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个年纪，她才是位学生。

从8岁到21岁，母亲的人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她后来屡屡交代，难以挣脱，直至被打成“反动党团骨干”“阶级异己分子”“中统特务”“历史反革命”，最后一顶“特嫌”的帽子又整整戴了七年？（1954年父亲陈兆祺和母亲在天安门前）



### 四十五岁半身不遂 五十四岁撒手人寰

1967年12月15日，寒风凛冽，对我来说，这一天刻骨铭心。

晚上，父亲带着我们从外面回到铁一号。铁一号就是北京张自忠路三号，人民大学宿舍，我的家。母亲已经失踪好几天了，问父亲：妈妈呢？他的回答总是：在西郊忙运动！

铁一号大门灯光昏暗，一迈入红漆大门，冷风迎面扑来，眼前的钟楼格外阴沉，没有一个行人。父亲加快了脚步，拽着我们沿着缓坡赶紧往上走。但我忽然发现坡面有一条刚刚刷上的巨幅标语，从钟楼前一直刷到大门口，每个字都有斗大。谁又被打倒了？我十分好奇，挣脱了父亲的手，沿着缓坡看上去：“打倒中统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潘嘉！”字字都让我心悸不已。

父亲一把抓住我的手：别看了，赶紧回家吧！其实，不看我也一样会知道。灰楼、红一楼、红二楼，当我们走过时，铁一号上空正回荡着大喇叭的广播声，一男一女、一人一句，声音清脆高亢：战报！战报！现已查明，我校档案系的潘嘉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国民

党中统特务、三青团骨干、历史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

回到红二楼丙组一号我的家后，父亲马上将我们兄弟三人关进卧室，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出来。正在我家帮助照看我们的姨外婆死死把住卧室门，不准我们开门。

此时的窗外，已是汽车逼近声、大呼小叫声不断，声震屋宇的撞门声接着响起。我听见父亲开门，然后有人在厉声喝问，家里似乎顿时挤满了男男女女，吵闹不休。有人敲我们的卧室门，姨外婆打开门，几个人进来看了我们一眼，又出去了。姨外婆再次将门顶住。

门外整整喊叫了一夜。次日清晨，我去上学，父亲已经不见了踪影，几个陌生人仍坐在我的家里，有人质问我：你妈妈呢？我回答：不是让你们抓走了吗？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开始在胆战心惊中过日子。（1955年父亲和母亲在铁一号留影）父母不见了，家也被抄了，周围是冷漠和歧视的目光，大标语、大字报隔三差五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母亲的名字已经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每天晚上临睡前，我们都用父亲早已准备好的三合板将窗户顶上，但还是不断有人在夜间砸门，声称查户口，一些愣头愣脑的人经常进来转一圈，问了几句话又走了。在天津大学教书的三姨和三姨夫听说后，赶紧来到北京，将我们兄弟三人都接到天津。

直到父亲被释放后，我才回到北京。见到父亲时，从他的举止中发现他曾被暴打过。原来殴打他的就是他的学生，打的时候先用麻袋将他罩住，再用麻绳绑住。

给母亲按上各种罪名的最初是人民大学的群众组织“新人大”，但没过多久，与“新人大”对立的另一派“人大三红”也将母亲“揪”了出来，两派都称我的母亲是中统特务、反动党团骨干、阶级异己分子。母亲长时间被拘禁在西郊的人民大学。

四周过去非常熟悉的叔叔们忽然间不是冷若冰霜，就是如凶神恶煞一般。有几个专程去南京轮番审问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有一个将我的三姨从天津骗到西郊人大，拍桌子瞪眼睛地要她揭发我的母亲。一天，有一邻居过来找我，说我母亲被关在西郊，要我带着她所急需的生活用品，赶紧去西郊看她。我换了几次车终于来到西郊人民大学，这是我头一次走进西郊人大。人民大学正被两派分割，四处都是防御工事，外面见到的人个个头戴



头盔，手持长矛和棍棒，高音喇叭在互相攻击。我打听了半天，才来到一座教学楼的教室里，里面有的面孔并不陌生，一个住在我家楼上，一个就住隔壁。他们看见我，失去了往日的亲切，我也没敢称叔叔，只问他们：我妈妈呢？他们回答，你把东西放下吧。你妈是反革命，不能看！

（母亲在人民大学研究生班的毕业证）被关押期间母亲是什么情形，我从来没听她提起过，她去世以后，曾与她关押一处的方志西（人民大学原副校长邹鲁风夫人）回忆：潘嘉同志很坚强、有原则，从不屈服！究竟如何坚强、怎样不屈服，没细说。

1968年的8月，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人民大学，两派武斗停止，我想，这回我总能见到妈妈了，可是却接到母亲的一封信，说她已经到北京水泥厂参加劳动，周日可以过去看她，还告诉我如何乘车。北京水泥厂在五棵松，那时我觉得五棵松好远，坐了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才找到。少年时就患有严重风湿性心脏病的母亲，时隔8个月，当我见到她时，她走路迟缓，面容惨白。那年她41岁。

紧接着，殃及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临，母亲再次被当作重点审查对象，父母都住在西郊人大，不能回家。有一天他们终于回到铁一号的家里，可次日在我家里就召开了一场家庭批判会。来了一个军宣队的军人，还有一个档案系的女学生，高高的个头，披着军大衣，趾高气扬。军宣队员先来了一段开场白，随后女学生发话，她自称是革命军人出身，直呼我父母的姓名，连老师都不叫。她先讲了半天我母亲的历史问题，然后就要



我们一起帮助我的母亲认清历史问题，老实交代。我们一声不吭，全家静悄悄的。女学生只得在那里独自述说了一番自己的光荣革命家史，介绍了一通自己是如何学毛著闹革命的，说以后这样的家庭批判会还要经常开，过后就和军宣队员匆匆离去。

家庭批判会尽管没有再开，但父母依然住在西郊人大不能回家。1969年11月，我们



全家终于团聚了，地点却是在江西余江县的锦江镇。父亲先赴江西，母亲被允许回家后卖掉了家里的所有家具和书籍，退掉了铁一号的房子，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然后拉着我们，随着人大的几百号教职工和亲属，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达鹰潭。

到达鹰潭时夜幕已经降临，下车后我看到母亲坐在行李上，不停地喘息，但她还是强打精神，站立起来，背着行李，要我们手拉手，跟随人群，千万别掉队。她不时将手按在我和哥哥的肩头，好像要摔倒的样子。一位过来打招呼的阿姨发现了，告诉我们说你妈妈恐怕撑不住了。我们赶紧将妈妈

（1950年代母亲在西郊人大）肩上的行李都扛在自己身上，那年，哥哥13岁，我12岁，弟弟9岁。

鹰潭街道路灯不亮，数百人在黑暗中前行，从火车站走向码头，活像逃难的队伍。好不容易来到江边，眼前这条江叫信江，我们乘坐机动船前往锦江镇，江风吹来，分外寒冷。机动船行进了很长时间，我不停地发问：怎么还没到啊？母亲说：快了、快了！终于，岸上一片灯火摇曳，那不是电灯，而是盏盏马灯，先到的人们正在岸边提着马灯等候我们。其中就有我的父亲，他高举着马灯，呼唤我们的名字。

我从来没在南方过冬，到了江西才知道，原来在这里过冬比北方还冷。房子的木板墙露出一条条缝隙，雨雪过后，即便白日外面有了阳光，屋内却依旧阴冷潮湿，夜里，被子加棉衣，整个头蒙在里面，还是直打哆嗦。母亲的心脏病加重，就留在锦江镇学习，父亲



去了刘家站，那里是人民大学五七干校，距离锦江镇五十公里，一个季度才允许回来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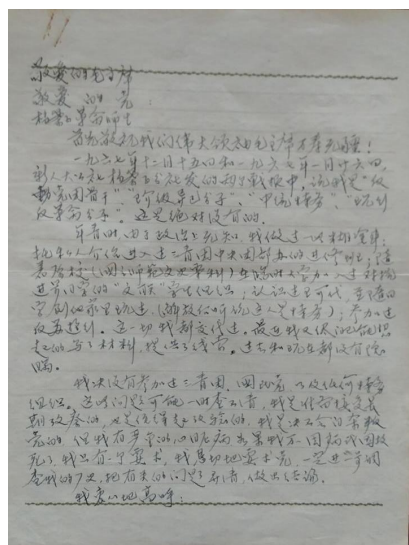
母亲学习的地点在五七干校驻锦江镇办事处。外婆客死天津，我拿着加急电报赶去找母亲，她正坐在马扎上学习，当即抱头痛哭，坐在她身旁的人民大学副校长崔耀先和档案系的同事李毅慌忙劝慰她。母亲想请假去天津奔丧，但被拒绝，前一年我的外公去世时，同样也不准母亲回南京。母亲是孝女，不能见父母最后一面，心灵的伤害更让她病上加病，躺在床上多日不能下地。尽孝不能，养病很快也被终止，一声令下，母亲去了刘家站。在五七干校，夫妻分离，男女分开，父母相隔也很远。

我骑着自行车翻越丘陵、涉水过河，去刘家站看望父母。

只见我的母亲正蹲在那里分拣石头，人显得格外虚弱。

锦江镇闹肝炎，许多孩子都患病，父母便叫我带着弟弟从鹰潭坐火车去浙江湖州投奔我的姨外婆。母亲不能送我们，父亲只能送到鹰潭火车站。我探出头去，向父亲招手，看着父亲孤独的身影，想到母亲还在石场分拣石头，赶紧扭过脸去。

在浙江湖州，我只接到父亲的来信，从没见到母亲的字迹。一年后，当我接到父亲的电报，让我回北京后，我才知悉（母亲在文革中的交代之一）母亲在干校曾多次被送往医院抢救，还专程去南昌医病，但病情从未好转，一拖再拖，直至根本不能劳动了，才同意她返回北京治疗。在铁一号红三楼丙组二号，母亲、哥哥和我住在其中的一间里，我们每周都陪母亲去阜外医院看病，母亲一举一动看起来很累，弯下腰也会喘息半天，去食堂买饭都吃力得不行。1972年3月的一天，她忽然倒在地上，送往医院后，虽然救了过来，但从此半身不遂，这一年，她年仅45岁。卧病九年，1981年3月30号，母亲永远离开了人间。去世那年，她只有54岁。



## “特嫌”的帽子，整整戴了七年

回想母亲的一生，卧病九年，也就是半身不遂的九年，大概是她最幸福的九年。

这九年，母亲的思维十分简单，复杂一点的事情，她都是摇摇头；她的记忆单纯，那么多痛苦的往事，似乎已经从她的脑海里彻底抹去；她言语表达浅显，可用的词句不多，无法用丰富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其实她的心情也只剩下一喜一怒而已。

人民大学被撤销后，父母一起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1975年12月，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专门作出《关于潘嘉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次年1月23日，北京



师范大学特意来人将意见告知母亲，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她面无表情，好像在努力回忆什么、思索什么，最后在我父亲的帮助下，签上了自己的姓名。1978年12月28日，已经恢复的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母亲的历史问题再次作出结论，母亲面对结论，只是微微一笑，她究竟还记得些什么，事后我问过她，她只是摇头。

无论北京师范大学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对母亲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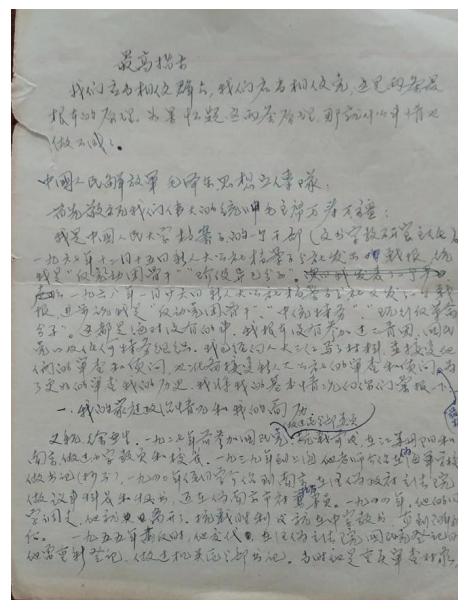
（母亲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和“结论”都称，文化大革命中对她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审查，最后，“特嫌”问题应予排除，参加三青团问题应予排除。这表明，母亲的两项历史问题整整审查了7年，如果按照人民大学的结论日期，就是审查了整整10年。尽管最终都是“应予排除”，但母亲此时只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病人，任何审查和嫌疑，对她都已经无所谓了。

这九年，我们住在铁一号红三楼丁组四号，寒来暑往，父亲精心照顾母亲，母亲什么都不必思考，只有一步一挪，缓慢散步，只有从早到晚斜靠在椅子上，静静休息。她亲眼看见我们兄弟三人相继考上大学，在她的心里，除了我们之外，似乎什么都不重要了。望着母亲对往事的麻木，对政治的冷淡，对社会风向的无动于衷，我怎么也无法与过去的母

亲联系起来。

1947年5月，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零运动”中，她曾冲在上海暨南大学学生游行的最前列；1948年3月，她以暨南大学女同学会干事的名义公开号召全校同学赴杭州春游，其实是集体致祭1947年10月被害的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在暨南大学著名的“四八”反迫害行动中，她又成了名人；1949年4月，她英姿勃发，挺立船头，身为“解放大军”的一员，横渡长江；她曾满怀豪情，身着军装，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上海，在外滩与当年的地下党战友欢声笑语，合影留念。可最后，这一切在她的心目中灰飞烟灭。因为最终所有的历史经历留给她的都是痛苦与折磨，无非就是一次次的交代、交代。我的母亲曾经非常“革命”，也曾经特别“进步”，而且发自内心。在《人生不是梦——红军女战士程桂芬回忆录》中就提到过我的母亲，说她是进京路上的组长，从北京火车站下车后，她要求大家排起队，整齐划一，走进市里。母亲最喜欢唱的歌，曾经是《唱支山歌给党听》；

最爱给我们朗读的小说是《红岩》，总让我们收听的广播是《王若飞在狱中》。但当《红岩》被批判为大毒草、作者罗广斌惨死，早已遇难的王若飞也被定为叛徒时，母亲就沉默了。文革之初，她曾和同事一起组织了“从头越”战斗队，四处摘抄大字报；1968年1月29日晚上，也就是农历除夕夜，在她写下的交代中，抬头就是“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党”，结尾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全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卧病之后，在她的有限言辞里再也听不



（母亲在文革中的交代之一）到任何政治词汇，革命与她完全绝缘，因为革命的结果，不过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审查。

1973年开始，母亲当年在暨南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在上海地下党的战友、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处工作的同事，纷纷从牢里、从学习班中、从五七干校出来，重新工作。他们

常常来看望我的母亲，聚会吃饭，畅谈往事。我不时被父亲派到东四十条路口的江苏餐厅要几个大菜，带回来摆上桌面，然后坐在那里，听他们闲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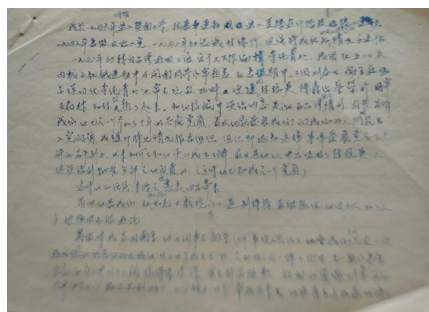
常来的有费志融，他是母亲在上海地下党的直接联系人，曾任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司长、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副总经理；有徐萌山和石敏夫妇，徐萌山是台湾人，常年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秘书长，石敏就是我母亲的入党介绍人；有金尧如，他当时是香港文汇报总编辑，聊起天来绘声绘色，中外典故脱口而出；还有一位张连，他在文革前曾是中共晋江地委副书记，后又当过福建省委对台办副主任、福建省科委副主任；白明来的次数很多，他也是台湾人，少时曾经练过马术，在上海暨南大学游行时，他奋不顾身，冲向前来弹压的宪兵马队，将头马扭转过头，其事迹传诵一时。几年前，我在台中市的诚品书店看到一本《一九四六，被遗忘的台籍青年》，里面看到了多位我熟悉的名字，都是母亲的好友，其中就有白明。原来，1946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为了让台湾学生尽快接受中国的高等教育，专门举办了一场公费生考试，录取92名学生到大陆的大学就读。不想，1949年后，这些公费生的三分之一留在了大陆，与台湾亲人一别就是几十年。

来看望母亲的还有母亲在华东局工作时的两位老上级，一位是上海市档案馆馆长罗文，1927年就加入中共；一位是李波人，曾任刘少奇的秘书，在秦城监狱蹲了9年，1975年才见天日。李波人的家就住在魏家胡同，距离铁一号很近，所以常来我家闲坐。他们在我家里聚会时，母亲都是靠在旁边静听。他们聊的那些往事，母亲是否还有印象，我不知道，但在我的心中却牢记下来。知道了他们当年在暨南大学的学生生活，知道了他们是怎样在沈崇事件后策划游行示威的，知道了他们这些地下党员是如何入党、如何联络的。而李波人，原来1935年5月开始，他就在苏州军人监狱坐过两年多的大牢，在他的一生中，有11年是在牢房中度过的，既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但我最不解的是，在他们交谈时，只要一说到当年的地下斗争，虽然惊险，尽管有性命之虞，但都津津乐道，神采飞扬，不无自豪，而且事无巨细，记忆犹新，而一进入他们从地下转入地上，还担任了各种职务后，却几乎很少提及，似乎处于失忆状态，也失去了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或许，他们根

本不想记起或言及一些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

## 母亲的交代，说的都是什么

在母亲的一生中，有两次遭遇罪名：一次是1948年，当时的“特别军事法庭”以“共匪间谍”罪，对母亲发出逮捕令，暨南大学开除了她的学籍；一次就是文革，其间最重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罪名便是“特嫌”，即特务嫌疑，另一项则是参加三青团的嫌疑。



罪名，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是无奇不有，因文字而锻炼成狱，史不绝书；株连九族，则是世界之最；而腹诽心谤、莫须有之类，更是天下一绝。但到了历次政治运动，尤其到了文革，所有罪名加起来，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且登峰造极。言论、思想、日记、写作，不但可以获罪，

(1951年母亲的交代之一)还能处以极刑。修正主义、经济主义、机会主义、阶级异己分子、社会关系复杂、里通外国、历史复杂、历史问题、坏分子、特嫌、右派、“恶攻”等等，如今听起来，根本无法想像，怎么也能成为罪名？然而，这，就是我们经历的一段历史，就是我们曾经度过的岁月。这些莫名其妙的罪名，其特点就是内涵宽泛、无边无沿，可以随便取舍，任意诬陷。只是嫌疑，而且是捕风捉影的嫌疑，就足以将人审查、批斗、关押、审讯、劳改，身陷囹圄，直至处决，还能株连亲人、同学、朋友，影响所有的生活。

从母亲的交代底稿里可以看出：

我的母亲成长在南京，家境贫寒，十个兄弟姊妹里只活下来五个，虽说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长期担任教师，但在那个几番易色的都城生存，也发生过各类“历史问题”。

我的母亲先后在南京临时大学、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前者拥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后者的学生中有很多是华侨或华侨子弟，有的还来自台湾，这让母亲和同学们在新社会不能被审查，互相作证。

1947年，我的母亲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投身地下学联领导的学生运动，而地下党员，



尤其很多南方地下党员后来的遭遇，曲折坎坷，磨难重重，身为其中一员，母亲自然在劫难逃。

1951年11月，正值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母亲写下的交代就是让她证明、说明当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与她相识的那些人的情况。从怎么认识他们的、他们当时的政治表现和思想状况，一直到他们何时入党、有无被捕、参与过哪些社会活动、还认识哪些人等等。其中有一位张连，母亲在世时，与我家往来多年，其丰富多彩的革命经历值得一叙。

张连是福建安溪人，至今仍健在，被报刊誉为“百岁革命老人”。他原名林绿竹，1939年加入中共并任安溪龙门支部书记，在暨南大学读书时，担任过地下党支部书记，还任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的宣传部长。1946年他带领一批暨南大学、集美学校学生党员到台湾创建闽西南白区中共台北支



部，曾四处台湾，以闽西南白区中共巡视员身份在台湾从事地下（母亲在南京读书时）工作，1948年5月参与组建中共泉厦临时工委并任书记，当过中共安溪中心县委书记、闽粤赣游击纵队八支四团副政委。

1948年初，张连自台湾回来后住在大公报主笔李纯青的家中。李纯青也是安溪人，又多年定居台湾。那时，暨南大学有几位来自闽南和台湾的学生常去李家玩，母亲与这些人是要好的同窗，因而也成了李家的常客。在李家，母亲与张连相识。在母亲的交代文字中，我看到了据她所知：张连在当时一共发展了几个中共党员、张连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在上海和我母亲见过几次、在南京何时何地见面、南京见面的谈话内容、张连爱人的情况等等。

这段日子，母亲所写的交代，显然是因为有人受到审查，所以要求母亲出面作证。

在母亲的交代底稿中，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两份，一份交给档案系“革命师生”，一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者是当时揪出他的那两派群众组织，后者就是被派驻人民大学、执掌学校大权的军宣队。这两份文字，母亲交代的历史问题，几乎

一致，可谓不厌其详，一丁点事情，都要反复述说。

母亲交代了她的家庭，我的外祖父曾被认定有严重的历史问题，1955年“肃反”运动时，外祖父曾被当时正任教的南京同济高级工业学校开除，但1956年又被恢复教职。母亲没有说的是，这是因为1956年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我的大舅舅在南京加入了三青团，1946年赴杭州青年军学习，做过副分队长，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时又参加刚组建的新中国海军，1956年复员，1958年被划为右派，判处劳动改造。母亲没有说的是，我的这位大舅舅从海军被迫复员的原因就是他曾经参加过三青团，而我直至1981年母亲去世时才第一次见到大舅舅。20多年来，他一直在做苦工，与我见面时，已形如骷髅。

母亲八岁时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呢？原来那时我的外祖父在小学教书，而潘文华（民国二级陆军上将，28集团军总司令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易帜，任新中国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弟媳妇在其夫逝世后正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南京，孩子们就在我外祖父任教的学校读书，因为学习成绩欠佳，潘的弟媳就邀请我的外祖父常去家里给他们做家教，为了两家更加亲近，她还认母亲做了干女儿，我的母亲也因而改名为徐蜀文。这件事到了文革，便演变为母亲的一大罪状：四川大军阀的干女儿。

1945年初，我的母亲在南京国立师范的文史专科求学。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要求所有日伪统治下的大专学生都集中到南京临时大学补习。这是抗战后教育史上的一件要事。

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规定凡在收复区（即沦陷区）专科以上学校包括已经毕业及尚在校学习之学生，必须通过甄审，始承认其学籍，并在多地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补习后，经过甄别考试，由教育部颁发《审查合格证书》。这一办法公布后，学生们认为是对沦陷区学生的歧视，不但罢考，还上街游行和请愿，高呼“学校无伪”“学术无伪”“学生无伪”的口号，认为学校不同于政府，不能把沦陷区的学校称作“伪学校”，更不能把学生称作“伪学生”。当局只得取消甄别，改由学生自己按原来年级，选择相应院系到临时大学就读。



1946年6月，临时大学撤销，应届毕业生修业期满者，发给毕业证书，授予学士学位，未毕业的学生则按其所学院系与地区，分配到各地大学继续读书。

对母亲的怀疑，在于南京临时大学有一个“文联同学会”的学生文化组织。1945年12月，昆明“一二一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浪潮此伏彼起，史称“一二一运动”。在南京临时大学里就读的原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在中共南

（1949年母亲【中】与战友，右为她的入党介绍人石敏）京地下党发动下，成立了“一二一同学会”，举行了反美示威，而我母亲原来所在的国立师范学生则集体加入了另一学生组织“文联同学会”，还参加了反苏大示威。反美是左翼学生的一贯做法，但当时为什么很多学生还要反苏？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也就是著名的《雅尔塔协定》，以维持外蒙现状和控制东北铁路及军港为交换条件，换取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八一五”东北光复，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要求苏联撤军，但苏方百般拖延，不但称旅顺港及大连港、满洲铁路权益为苏联所有，还宣布东北154种工矿企业为苏联战利品，令中国国内舆论鼎沸，而苏军拆运东北厂房、机器的事实被披露后，更激起社会各界对苏联的不满。1946年1月16日，国民政府经济部东北区接收委员张莘夫及其随员八人，前往交涉接收抚顺煤矿时竟被杀害，接着，《雅尔塔协定》内容公开，其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使举国震惊。2月中旬，南京临时大学5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友邦军队依约撤退”“请求政府查究张莘夫被害真相”“坚决反对雅尔塔协定有损中国主权部分”，此次示威成为全国反苏运动的先声，随后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抗议示威，尤以重庆最为激烈，反苏中当然也包含着反共。

参加各地的反苏大游行，后来成为很多人一生的“污点”，不断被审查，被要求交代。先父也曾因为在上海差点参加了反苏游行，生前就多次交代原因，直至改革开放后才终止。

对“一二一同学会”，母亲在交代里称不了解，但有些面孔熟悉，后来在华东局、在人民大学时曾多次见到其中一位姓康的女同学，曾任刘晓的秘书。刘晓就是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母亲还与南京临时大学同学王可玳相识，从1975年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和1978年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的审查看，王可玳被认定是中统特务分子，“文联同学会”实际由王“控制”。看来，由于参加了这个“文联同学会”，参加过反苏游行，再加上认识了这个王可玳，于是，母亲就沾上了中统特务的“嫌疑”。



我的母亲为什么还会被怀疑参加过三青团？

三青团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抗战期间官方组织的青年团体，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年都参加过三青团，有的实际是集体加入。凡是参加过三青团的人在江山易色后都曾被长期审查。而我的母亲，其实从未加入过三青团，只是在南京临时大学结束后等待分配期间，与我的大舅舅一道在三青团举办的一个进修班里进修过。

等候分配时，母亲非常焦急，因为家里生活拮据，还（苏北解放区，母亲与华东局秘书处同事）怕最终不予分配，无法继续求学。正巧我的外祖母有位从前的学生就住在附近，她的丈夫任职于三青团中央。我的外祖母听说三青团办了一个管饭又管升学的进修班，就托这位从前的学生代为设法，让我母亲和我大舅舅入班学习。进修班除了学三民主义，还学文史和数理化。在里面仅仅学了一个多月，母亲就接到国府教育部通知，被分配到上海暨南大学经济系继续就读。没料到，这一个多月竟成了母亲一生的“嫌疑”。

在交代中，母亲一件件叙述了暨南大学读书时的情况，如何加入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如何组织、参加了各种游行示威活动，如何被发觉，如何被通缉，最后，如何秘密离开上海，进入“苏北解放区”。后来，她先在华东局城市工作部训练班学习，继而又在华东局

政策研究室和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任职。

1952年11月，母亲由上海进京，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期档案研究生班学习，研究专业是“苏联档案史”和“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导师是苏联专家谢列兹涅夫。1954年1月，母亲毕业留校在历史档案系中国国家机关史和文书学教研室任教，直至文革。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母亲教学与研究的黄金期，她主编了《文书学讲义》，1981年又以《文书学纲要》的书名出版，还在专业刊物上不断发表论文，对“苏联机关文书处理中的监督制度”、“文书立卷”、“领导指导类问题的产生”等一一发表独到的见解。其实，从1962年开始，因为心脏病不断发作，她已在家休养，还多次以身体状况和家庭历史问题为由申请调离档案专业，不料，文革的疾风暴雨来临，无情地将她抛了出来，以致一病不起。

八岁时偶尔认了个干娘、半年学习期间集体加入了一个学生文化组织、参加了虽然反苏却很爱国的游行、在官方组织举办的一个进修班学习了一个来月，如今想想，这些对青少年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可就因为这些，却让我的母亲一生不得安宁。

在母亲的交代里我还看到，早在1950年，当她在华东局秘书处任职时，就曾经赶上过一个小规模的运动叫“编年纪事”，虽然名称看起来挺有文化意味，但内容就是要求所有人将自己的过去按照编年，一一交代清楚。母亲在这个运动中曾经将上述问题已经说了一个遍，还做了检查。算起来，这点事竟让母亲反复交了三十年！

翻阅母亲的一页页交代，从发黄的纸张、繁体字，直到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最高指示”“万寿无疆”“万万岁”，每读几百字，我就不得不起身，站在阳台，极目远望，借以舒缓压抑的心情。掩卷沉思，除了母亲生不逢时的感伤外，唯有一声叹息。■

作者简介：本名陈原，笔名顾土，人民大学历史系1978级学生，曾先后在出版社、报社供职。



## 【怀人】

## 寸草心犹在，不忘慈父情

——在五七千校，父亲仰药自尽

项威

2017年是父亲百年冥诞。1970年5月2日，父亲在江西余江刘家站人民大学五七千校仰药自尽，至今已47年。



父亲项冲，字怡如，浙江杭州人。1934年考进燕京大学经济系，1938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在上海交通银行任办事员。上海沦陷时避难杭州家中，不久就和同事一起辗转逃到重庆，仍在交通银行任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成为盟国，美国不仅提供物资援助，而且也愿

（项冲与妻子，摄于1949年）意为中国培养战时及战后复兴所需的人才。正因如此，美国增加了中国赴美留学生的数量和奖学金的额度。在这种情况下，父亲选择了参加美方组织的留学资格考试，成绩尚佳，成为第一批留学生。

当时国民政府对此也很重视，决定在第一批学生赴美之前组织一次培训，为期一月，内容是军训和党化教育。蒋介石亲自出席培训班的开业及毕业仪式并训话，冯玉祥、宋子文等也莅临发言。培训结束之后，父亲于1944年抵美，入纽约大学商学院学习，1948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仍在交通银行任职。

1948年，父亲在交通银行沈阳分行任襄理，此时的东北已经是风雨飘摇，势如累卵。在沈阳城破之前父亲返回上海，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他辞去交通银行的工作，转到沪江大学任教。1950年父亲又赴燕京大学，任经济系副教授，于是我们全家也由沪迁京。

1953年燕京大学消亡，父亲进入中央财经学院工作，1955年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

经济系任副教授，直至去世。

我的母亲 1948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学士学位。随父亲到京后，先在人民大学图书馆工作，后在人民大学附中任英文教员。

我的父母都是平凡而普通的人。他们也像普天之下的父母一样无微不至地关爱我和妹妹。我的父亲是一个谨慎的人，平安躲过了一个又一个政治狂潮，然而在那“风波不断连天浪，扫尽英才剩夕烟”的时代，终于被文革血海吞没了。

文革初期，我家并未遭劫。虽然亲戚朋友被抄家，殴打，游街的比比皆是，其中我的四姨妈也就是母亲的姐姐，因不堪红卫兵暴徒的殴打而割腕自尽。随着文革向武革转化，在 1966 年秋末冬初之际，人民大学两派也开始兵戎相见。从 1967 年下半年恐怖来临了，两派的广播站总是在夜深之际先播放一段红色暴力音乐，随后如狂犬般的吠叫：战报、战报，我们抓出了大叛徒某某，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肃杀之气笼罩我们。

1967 年 12 月 27 日，夜静更深之际，突然某派广播站播出了抓出我父亲的战报，与此同时大门也被敲得山响。我开门之后就看见几个学生模样人，他们是抓父亲的暴徒。母亲含泪对我说：陪爸爸一起去吧。于是父亲和我一起在这几个暴徒的押送下来到图书馆楼。随后，暴徒让我在大厅等着，他们把父亲带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其中两个暴徒带我父亲回到大厅，借着昏黄的灯光，我看到父亲的面颊红肿，口鼻流血，步履蹒跚。我赶忙扶住父亲。长夜漫漫，寒风凛冽，子挽父行，一路无言……

自 1968 年 3 月北京各高校都开始进入武斗阶段，住在原林园四楼的家也成了“新人大”的前线阵地，我们全家也只能到人大附中暂住。武斗虽然使我们全家失去了住房，但也有值得庆幸的一面。这就是那些暴徒不会三天两头到家里逼迫父亲交代所谓的问题了，因为暴徒们已经忙于打派仗而无暇他顾。所谓问题，主要就出在那个留美前的培训班上，尽管父亲在 1949 年后如实交代了这个问题，但毕竟记入档案，此时就成了特务、历史反革命的所谓证据。

1968 年 6 月 27 日，我不得已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临行之际父亲执手相送，

全家黯然相视。我劝父母和妹妹留步，独自一人去北京站，远赴他乡。到兵团之后，由于好几个同学的处境与我相近，故处境还算不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施行工资制，月薪32元，这在当年足以满足自己的用度而且略有节余。应该说，在面临一系列糟糕选择的时候，我所做出的选择还不是最糟糕的。

后来接到母亲的信，我才知道人民大学的武斗在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之后已经结束，“人大三红”“新人大”也归于消亡，但父亲却被军宣队集中审查了，至于详情母亲在信中并未细谈。及至后来母亲才告诉我，父亲的审查已经结束，回到家里。这真让我如释重负，以为难关已过。1970年1月，我到黑龙江已近两年终于获准回家探亲，春节之前到京，终于见到了父母和妹妹。在此期间才知道父亲被关押审查期间，多次被批斗。每言及此，都被父亲用其他的话叉开。母亲告诉我父亲被定性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探亲期间，父亲和我谈到了自己的历史，并且提出来去五七干校的打算，母亲和我都不同意，因为父亲的身体不好，失眠非常严重，况且我在黑龙江，母亲患风湿性心脏病，妹妹还是小学生，父亲独自



去干校是很让人担心的。然而父亲没有（人大武斗劫余——项冲一家最后一张全家福）改变决定，就在我即将返回黑龙江的时候，父亲告诉我，他要求去干校的申请被批准了。事后我们猜想父亲是为了减轻对我和妹妹的影响而主动申请去了干校。

1970年2月25日，料峭春寒。我乘晚间的65次直快离京。我不让家人送行。但父亲执意不肯，带着妹妹送我到北京火车站。一路上我不断劝父亲早点回家休息，但毫无效果。直到我上了火车，还是看到父亲拉着妹妹伫立在站台上。我急忙下车，只见父亲和妹妹泪流满面，刹那间我不禁热泪夺眶而出。我只会说，你们回去吧。父亲说，你

补张卧铺票吧。列车就要走了，我回到车厢后，看到父亲拉着妹妹，依然站在站台上。谁知道这竟是永别！

1970年5月下旬，接到母亲来信，才知道父亲于当年5月2日在江西余江刘家站人民大学五七干校服毒自尽。母亲带着妹妹去干校料理后事已毕，且已回京。刹那间，父亲拉着妹妹为我送行的那一幕又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最后，我用父亲留下的一首诗作为永恒的纪念吧：

锦绣年华逐逝波，  
王谢世家奈若何？  
读书万卷直须破，  
下笔千言悔更多！ ■

作者简介：1950年出生，1978年考入人大计划统计系，毕业后在国家统计局出版社工作。

## 【述往】

### 长矛刺入他的头颅 7 公分

李豫生



在1968年5月22日那次血腥的武斗中，有新人大公社的三名同学当场被刺死，他们是陈荣祖（计划统计系）、廖金妹（农经系）、杨大志（农经系）。还有一位同学是经济系四年级的沈士根，他被对方的长矛矛尖从右眉框骨刺入颅室7公分，形成血肿，以致瘫痪。一年多后同学毕业，因唯一的亲属——同父异母的哥哥不耐烦护理而死亡。

（本文作者李豫生）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校以后，曾对武斗事件进行调查，但是始终未能

有明确结果。“究竟是谁当场刺死了同学？”——成为人大文革永久的悬案。尽管有千万条理由把发生武斗的责任归结于文革发动者头上，但是，“枪口抬高一寸的权利”呢？那些下狠手刺死同学的人，只有你们自己心里清楚。虽然你们逃过了责罚，但在漫长的几十年岁月中，难道你们就没有扪心自问？你们的良心得安吗？

沈士根同学原本就是残疾，他的右眼失明，装的是义眼。可刺人者偏偏刺的是好眼——他的左眼！有人说，刺人者是认识他的！

多少年来我一直记住了7公分这个数字。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如果双方都是直立状态，长矛挺刺过去，一定是刺中胸腹，而对方瞄准的却是他的头部。长矛刺穿了眉框骨，直入颅室7公分，这长矛是如何的尖锐锋利，下手又是如何的凶狠毒辣。长矛是用钢管打磨而成，矛尖打磨的如此锋利，内心该藏有何等的仇恨？！而当时争来抢去的无非是证明谁比谁更革命一些而已！

5月22日这天，我是和一些同学一起送沈士根去医院的。当时我住北一楼，忽听到前面人声鼎沸，就连忙跟着一些人往后面的交通股跑。我那时是三黑人物——黑帮子女、铁杆保皇、资反路线执行者，高音喇叭里天天高喊“黑帮子女×××、×××挑动武斗”，我哪里还敢往人多的地方去？就是在校园里走路也怕有飞来横祸被人抓去。和同学走路是一前一后拉开距离，以防一起被抓，侥幸以为如果前面的人被抓，后面的还可以去通风报信，找人解救。而我当时往交通股跑是想能参加救援。

那会儿的交通股有一个门洞，我就站在那儿伸头张望。一会儿就看见有滴着血的同学被抬了下来，我凑近一看，是沈士根，我认识。沈士根是经济系四年级同学，校文工团舞蹈队的成员，和我熟悉。当下顾不得什么，赶紧坐进一辆轿车的后排，叫同学们把沈抬进来躺在我的腿上，由我抱住，直送积水潭医院。

当时的沈士根脸上有血，已经失禁，但还有意识，口里喃喃的叫着一个人的名字：“宋玉华……宋玉华……”宋玉华是经济系二年级的女同学，团支部书记，和沈士根是上海老乡，平常谁也不知道沈对她的心思，在这个濒危时刻竟然流露出来。



汽车飞快地开到了积水潭医院，外科急救室位于地下，东一堆、西一堆的都是“新人大公社”的同学。有的伤势轻一些，比如朱卫卫，包扎一下就可以了。但当我看到廖金妹同学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冰冷的地下，死去了。

医生最初给沈士根检查伤口，似乎伤的不甚严重，只是在左眉框骨的位置有一个1公分多一点的小创口。医生清创以后就把表皮缝合了。由于是局麻，沈士根并没有丧失意识，我们不停地叫他的名字，他都能应声。等他到病房里休息下来，我叫人赶快去找的宋玉华同学赶来了。宋玉华同学就近招呼沈士根的时候，他已经没什么明显反映了。

当晚，我和余景清可能还有他们班的王曙光同学就一直在那里守着，过一会儿喊一声沈士根的名字，开始他还能答应，到后半夜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就没有应声了。我们赶快找医生，再次检查抢救，经拍片检查才发现，有一个深入颅室7公分的创口渐渐渗血血肿，压迫脑干，伤情危重了！

沈士根后来是转到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做的手术，当我再看到他时，他的左额已经锯开了一个约5×5公分的大洞，装上了有机玻璃，以便于随时再做手术。这种手术方式当时很先进，就像当时的英雄人物麦贤德的手术一样。

沈士根被接回学校后，瘫痪、失语，但认得同学、听得懂同学的讲话。“新人大”的同学精心护理他，同学们轮流值班，给他做可口的饭菜，周身擦拭的干干净净。党史二年级的郭建成同学会民间伤科医术，每天把他背在背上自己做跳跃运动，帮他疏通经络。每次治疗下来，郭建成同学都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在同学们的护理下，沈士根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到邻近分配时，他已经气色很好，能端坐在轮椅上，笑着听同学们讲话。

毕业分配的到来是沈士根又一次厄运的开始。他是一个苦命人，家境穷苦，上学时穿的衣服还经常是由家织的土布做的。家中原本相依为命的老娘含辛茹苦地把他培养到大学，没有等到他毕业就已过世。在上海他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原本就感情疏远。同学分配，天各一方，再也没有人能来照顾他了。沈士根被送回上海的时候，只有新人大给了很

少一部分钱，可想而知，他的兄嫂怎么肯尽心照顾他。

我最后一次见沈士根是我1970年分配后到上海的时候，沈士根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极度消瘦、满身污垢，见到我和老余走近，浑浊的眼睛流下了泪水。他不住地用头向下撞藤椅的扶手，意思是告诉我们生不如死。我们无言，也实在看不下去，只能逃一样的走掉了。

此后不久，沈士根同学就去了。■

【述往】

##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

——孤岛时期

陆伟国

两派一分开，我们便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很狭窄的区域里。对方走北校门，我们只能走东校门，活动范围很小，近乎成了封闭的“孤岛”。因为外面的世道很乱，我们也很少出去。要出去，也就是出去上街刷个大标语，兜售个“人大三红报”。到后来，由于双方都在伺机抓捕对方人员，连这也不敢出去了。实在没事，就干脆回家。说明：本文中所用的“对方”、“我方”、“本方”等词语，均无褒贬之意，只是为叙事的方便。

对于文革时特有的文化现象：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这些，我们在“孤岛”里也有些特殊情况，不如外面那样的泛滥而喧闹。大喇叭里，或排队外出活动，唱语录歌是少不了的。几乎所有的毛主席语录、诗词都谱成了歌。大多数谱曲的水平也很有限。至今还会唱的，多为诗词歌，语录歌很少。个别的，如“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用的是湖南花鼓戏的调，用湖南话唱。对于我们去过湖南搞社教的人来说，别有一种情趣，印象当然深一些。

“三红”还搞过一个合唱团。我喜欢唱歌，至今年已七旬，有时还自己一个人在歌厅包个小间去K歌。但是我没有参加那种合唱团，没有那个兴趣。一是合唱分低音部、高音部，没法自己发挥，束缚人。二是那个年代的所谓革命歌曲，充满了假革命的味道。表面上是高唱革命，实际上干的却是丑恶、甚至是罪恶的勾当。至今有些人假装大唱“红歌”，实际上却是在杀人越货，还没看明白吗？

在“孤岛”里，组织不很严密，活动也比较松散。所以，尽管那时到处大搞“三忠于”、“四无限”，即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但是。在许多地方很狂热的忠字舞，在这儿跳不起来，没什么人跳。在许多地方每天必做的“早请示、晚汇报”，也没什么人搞。一些政治热情高一点的低年级同学或许也有做几下的。更没有人在说话时、在讲正事之前要先背上一段最高指示才能开口。毛主席像章，因为是外在的，别人看得见的，所以都还是戴的。至今，我还保存了一些，以作为那个时代永久的留念。

此处插一段：关于文革的第三战役“反击‘二月逆流’”。这是在1967年1、2月间的几次中央会议上，几个老同志对文革表示公开反对、对中央文革当面抗争，被极左势力称之为“二月逆流”。对此，这年的2月18日，毛泽东亲自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大不了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谭震林气愤地打断毛泽东的话，不但声明自己没有错，而且当着毛泽东的面，再度重申自己“三不该”：“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也不该活到65岁！”（引自：炎黄论坛历史区2012-7-1“1967年谭震林当面反驳毛泽东：不该跟你干革命”作者：孟昭庚）

这次事件，促使极左派加快夺权的步伐，派性争斗更趋激化，但对校内的直接影响

不明显。因为去湖南社教，谭副总理是我们的总领队，印象深一些，所以在这儿提一下。

再讲几件零碎的事。

1) “长眠与此”

整个形势的越发凶险，极端分子的持续猖獗，无辜群众和干部的受难，稍有不同意见就被残酷镇压。文化大革命，由穷凶极恶的“打倒”进入到了不择一切手段的“抢权”阶段，“伪革命”的原形日趋明显。两派组织，无论是造反，还是保守，都毫无意义。无论是参加“革命”，还是不许别人“革命”，也都毫无意义。

当我在相对空闲的宿舍里，静静地思考这些，一时间，内心有了很大的变化，由几多的疑惑、几多的失望，到几多的反感。可是又不能说，甚至不敢想，如果那样想下去，就太危险了。弄不好，不小心，漏了嘴，那下场就太可怕了。

又不能说，又不能想，更不能做，这怎么办？前面的路，在哪儿呢？

睁眼看世界，一片恐怖，那就闭上眼。“革命”，已经毫无意义；可向往真理，也无疑是不自量力。我忽而想到，在极左势力的猖獗之下，这生活，这生命，这世界，还有意义吗？不敢往下想，又再反过来想，生活没有意义，可是，死了，就有意义吗？这些日子里，有多少人想结束生命，从高级将领罗瑞卿、大文豪老舍，到眼前的王命先老师……多少生命的逝去，又改变了什么呢？血腥依旧，暴力依旧，罪恶依旧。

在孤岛里，唯一的好处是，和外面疯狂的世界有所隔离。我躺下了，不去看这些，不去想这些。带着对极左狂潮的极度厌恶，我干脆躺在床上，闭上了眼。闭上了的眼，一片模糊的黑影里，依然也是批斗，也是血腥，也是群魔乱舞、面目狰狞。耳边是不息的狂吼声、惨叫声……大脑里嗡嗡地尖声直叫。不能，不能再闭眼了。再闭眼，思维会更集中，精神会更紧张，真的要神经错乱了。那种喧嚣，震荡着空气中的每一粒分子，触动着身上每一根神经，躲也躲不开。还是睁开眼，默默地看着天亮了，看着天花板上的亮光渐渐地从西墙移到东墙，终于又渐渐地暗了下来。

一天，二天，三天……

每天只是中午起来吃一点。

每天要躺二十多个小时。

别的同学以为我病了。我真的是“病”了，不过不是细菌的吞噬，而是灵魂的塌落。

我想起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很有同感。

读者可别为我担心，我不是要舍弃这宝贵的生命，我只是想远离这可恶的世界。

四天，五天……

我觉得我已经浑身无力，精神恍惚，头重脚轻，走路都迈不动步了。

我才意识到，我不能这样下去了。

虽然是无比的厌恶，可是也不能和自己过不去啊。

虽然前面没有路，可没有路，也得走下去啊。

我又起来了。

### 2) 卖报郎

睁开眼了，站起来了，去干什么呢？



我虽在“人大三红”，但一些想法并不一致，很多活动也并不参加。那我去上街卖《人大三红报》吧。没有任何的报酬，只是报销进城的车票，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出去走走。抱上一书包的报纸，就去市里人多的地方，通常就是西单、前门、王府井这些。一边看光景，一边吆喝着：“快看报唻！快看报唻！快看‘人大三红报’唻！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文革’

动态唻……有山东的王效禹、山西的刘格平，有贵州的李再含、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有武汉的‘百万雄狮’和‘工总’，有重庆的‘反到底’和‘八一五’，有广西



的“联指”和“四二二”……哎！放眼全中国，胸怀全世界嘛，快看‘人大三红报’！”反正那时候事儿多了，报上的内容也真不少，有的可说的。吆喝起来没什么不好意思，反而觉得挺自在，常常能因此而想起那“卖报歌”里的小儿郎。三分钱一份，还是五分钱一份，已经忘了。卖不了，也不要紧，回去按少了多少份交现金。

可能那时关心政治的人多，都想知道本市和各地的文革动态，加上人民大学的名声在，那报纸还挺好卖。还真是卖了一段时间的报纸。可惜自己没有留一些下来作个纪念。现在要找这些，就很难了，得去海外的图书馆和高校研究所。网上说是零碎有卖的，我也没去试过。难能可贵的是，云南报纸收藏家汤克文先生，在网上看到本文后，当即从他仅有的两张“人大三红报”中给了我一份。当我收到那份泛了黄的报纸（日期是1967年7月29日，头版头条还是纪念批斗郭影秋一周年），心头不由得一阵震撼。在看到那些曾经熟悉的激昂无比的文革话语感到一丝可笑之后，便是悲凉，一种透彻心肺的悲凉，既是对自己被愚弄的悲凉，更是为千百万受苦受难者巨大伤痛而感受的悲凉。

卖报时，还真有一些人顺便买报、顺便询问讨论个什么问题。记得有一次，一位穿得很朴素的长者，步态颤巍，眼神伤憾，神情拘谨，四下张望后问我，这文化大革命的底到底在哪啊？那时有句流行的口号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一看，像是在运动中受到了打击，心里一定有很多痛楚没法说，想问问这罪什么时候才熬到头啊。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年月里，他为什么会问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呢？可能是他的心里实在装不下了，想问又无处问，只能对这样一个完全陌生、没有利害冲突、又非一脸凶煞的人问问了。我该怎么回答呢。我说，快了，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就到底了。可后来谁能知道，刘少奇去世之后，文革又延续了7年。要不是自然规律起作用，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场呢。

八、九十年代，我所在的学校是商业部所属院校（之前是粮食部和国内贸易部），部级机关就在西单。由于有粮食工作、统计专业、科研管理、学报工作、课题研究、全国职称考试命题等多个头绪，我常去那儿，也常常去重新漫步当初自己卖报的街头。那

时的顶头上司商业部教育司司长纪宝成，曾和他多次有过交往。后来他担任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2014年12月9日，已不担任校长职务的纪和其他校领导被叫到教育部，宣布撤销他的副部级待遇，勒令辞去所有社会兼职。据说是与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贪污受贿案有关。■

## 【述往】

### 我在文革中是怎样闹革命的（上）

林俊德

1966年4月18日晚，我参加在人民大学西郊校园大教室召开的全校党员大会，校党委书记孙泱在会上作关于参加学术批判斗争的动员报告，指出参加这场斗争是最突出的政治。他宣布，校党委决定把参加这场批判斗争作为当前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全力以赴投进去，以此带动一切。孙泱说：“如果我们丢掉了这一条，那就等于我们各项工作都没有政治、没有灵魂。”

孙泱还布置：初步计划普遍停课两周集中批判吴晗和“三家村”，然后，分三条线将这场斗争长期地、深入地进行下去，彻底清除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各个领域。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以战斗员的姿态积极投身这场伟大战斗，为粉碎各色牛鬼蛇神的进攻，为捍卫社会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列。

孙泱在报告中谈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固然有联系，但又不是一个问题。有些人是借古非今、借古讽今，这就不仅是学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有些人可能在学术观点上也有些错误，但他们是借古颂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两种人是根本不同的，应该区别对待。应该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

4月19日下午，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五位同志发言，表示了坚决投入这场思

想文化革命、斗倒斗臭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坚定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决心。末后，孙洪副书记代表校党委作动员报告，号召全校师生员工以战斗的姿态投入这场大革命，经受革命风浪的磨炼。这个会揭开了我校全面批判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序幕。

## 洪禹谈学术批判

同日中午，为借《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等大批判材料，我给中宣部洪禹同志打电话，他答应帮找找，找得到就借给我，如找不到，让我看看报上发表的材料。他说，能找到更多的材料，多看一些，当然好；如找不到更多的材料，看看报上发表的就差不多了。根据你们现在的状况，能把《北京日报》发表的那些材料好好消化，就很不错、就算是抓到要害了。况且其他各报还有许多材料，一下子也看不完。他指出，各方面的材料很杂，问题很多，应该抓住中心、抓住主要问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分析，把握问题的实质，不要东拉西扯、淹没在材料的海洋里。我顺便向他反映同学们对郭沫若的议论：许多同学认为郭沫若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封建统治者翻案、恢复名誉，这显然不符合主席思想，应该拉出来批判。（我班有同学写大字报：“这次再也不能让郭沫若滑过去了！”）他说，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你们，中央以及各报社都听到许多这样的反映。不过对这些问题应当具体分析，建议你们读读郭沫若的文章，拿它与吴晗等人的有关文章对照，看有哪些共同之点，又有哪些不同之点，不能一概而论。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5月2日下午，到洪禹同志家做客，受到洪禹夫妇的热情接待，他的夫人叶茜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洪禹同志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从我的谈话中看出我的提高，表扬了我的进步。他说，你来北京快四年了，四年中接触不是太多，却明显地感到了你的进步。拿现在的你同刚来京时的你比较，确实不一样，有很大的变化，水平提高了，你的谈话表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如果你现在给我们的感觉同刚来时一样，

没有什么长进，那岂不是白吃饭了吗？这除主观努力外，也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各方面都有所变化，搞得不错。这就很好！他希望我戒骄戒躁，看到好中还有更好的，进步快中还有更快的，虚心向同志们学习，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我又一次向他请教对郭沫若问题的看法，他对此作了详细的阐释。他说，郭沫若的学术观点是有不少错误，如大力为帝王将相翻案，歌颂帝王将相，可以说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不是说他同吴晗等人一样，都是借古非今、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都包含政治上的错误？那就值得研究。学术问题无疑是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但同什么样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则有所不同，吴晗等人的学术问题是同反动的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即借古非今、借古讽今；郭沫若似乎不是这样，他写的《蔡文姬》《武则天》等剧本给人的印象倒是借古颂今，想借歌颂曹操、武则天等封建统治者的丰功伟绩来歌颂毛主席的伟大。自然，这种做法是很不妥当的，起了歌颂帝王将相的反作用，造成许多不好的影响；但这类错误跟吴晗等人错误的性质就不相同，不能采用相同的办法去处理。既然郭沫若主要是学术观点上的错误，而当前反对的主要是政治上的错误，那就不能拉在一块打，否则就没有主次，就太不策略了。洪禹同志指出，革命的热情是好的，是第一位的，首先必须有敢于革命的精神；有了这一条，还必须学会如何革命，才能实现革命的目标，就是要讲究战略策略，不能蛮干一场、乱打一气。他特别强调要独立思考，他说，所谓经风雨、见世面，就是要在革命斗争中独立判断各种各样的问题，站稳立场。正确的东西要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错误的东西也要经过自己脑子分析、鉴定，然后给予批判，决不能人云亦云、颠过来倒过去、随风摇摆。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太容易的，要准备犯错误、受批判，但经过反反复复的锤炼，就能提高鉴别能力，使自己的立场站得更稳一些。他对郭沫若其人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个人一生曲曲折折、走了不少弯路，也可以说犯了不少错误，甚至动摇过，但最终还是走到共产党这边来了；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组织和团结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我党的许多同志都曾在他的掩护下工作，应该说，他还是对我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一定贡献的。对他进步的方面，我们总是应

该肯定的，也是应当欢迎的，特别是后期，总的趋势是向着党的。既然这样，我们就应当让他工作下去，过多地纠缠他过去的错误，把他搞得过不下去，那是不太策略的。我们对李宗仁回国都表示欢迎，说爱国不分先后，对郭沫若的进步也就应当欢迎。李宗仁现在过来了，如果我们还大揭他的老底，说他杀了多少共产党人，把他搞得过不下去，那也是不成的。简单的做法不利于团结 95%以上的群众投入革命事业。末后，议论到一个传闻：有不少人说郭沫若入党是工作需要，其实他并不够条件，只是他在青年人中影响很大，很多青年表示要走郭沫若的道路（先专后红），中央担心引起不良后果，才把他吸收到党内来。洪禹同志指出，这种说法既没有任何根据，本身也是前后矛盾、不能成立的：说中央是由于担心青年走郭沫若先专后红的道路才把他吸收入党，但是他的先专后红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会因为入党而改变，相反地，现在把他吸收入党，不正好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吗？即你专了，最后就能红；你只要有知识，中央就会接收你入党。这样的结论不是更遭吗？中央是不会做这样的蠢事的！这种说法是很成问题的，甚至牵涉到对中央的看法。这一席话给我极大的教育和启发，使我弄清了许多问题，学到了一些正确认识问题的方法。

5月8日，《解放军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指出：《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以及《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发表署名“何明”（后来得知此人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文章说：《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它们所摘编的《燕山夜话》的材料是“突出次要，掩盖主要，避重就轻，大事化小”。《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还分别用第二、三两版的篇幅，在《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林杰、马泽民、阎长贵、周英、滕文生、靳殿良等人摘编的《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这件事使我大为震惊，深感斗争的尖锐、复杂，自己的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疑问和忧虑：这两个刊物与北京市委、市委三人



（刘仁、郑天翔、万里）领导小组是什么关系？“编者按”是不是三人领导小组写的？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领导小组、怎样估价市委的整个工作？斗争将如何进行下去？

同日傍晚，给洪禹同志打电话谈了一些情况和想法。他特别提到今天《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材料，他说这些文章、材料的发表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深入；而情况是很复杂的，形势发展很快，人的认识往往赶不上，必须抓紧学习，紧紧跟上去。他诚恳地检查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说过去由于没有好好读《燕山夜话》，不知当中有些啥货色，在人家发表材料时就看不出有什么不足，前次在跟你谈话时还说《燕山夜话》的文章那么多，一时看不过来，不一定要全看，看看《北京日报》发表的那些材料大体就差不多了，就能抓住最主要的东西，因为人家编材料总是把主要的东西摘出来，不可能把次要的东西摆了一大堆、主要的东西倒没有。现在看来这个认识是很成问题的，《北京日报》摘编的恰恰是次要的东西，而把主要的东西有意掩盖过去。他希望我好好学习，注意观察，认真分析各种各样的材料，从现象中看本质，抓住最主要的东西。他尤其强调要独立思考，要善于提问题。对很多人、很多事现在还分辨不清，有不少还涉及到高级干部，不要乱下结论，应该多看、多想。像邓拓这样的人物总不能算低级吧，可他是个反党分子；再高的还有赫鲁晓夫，他是苏联的头号人物，高级得很，却是个修正主义者。对这样一些问题可以好好想一想，但也不要毫无根据地乱猜疑，造成不必要的混乱。至于当前思想界不太安定，那是很正常的，在这样大变革的形势下，很少人能置身事外，每个人都都要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怎能安定得下来呢？洪禹同志这番话含义很深，值得仔细回味、多加注意。

5月17日下午，我所在的国际政治系开班会，国际共运史课教学组组长李景荫老师传达系党总支扩大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当前正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由学术批判发展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由一般的思想意识形态斗争发展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这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伟大决战，是关系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前途和命运、关系世界革命人民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党总支

要求全体同志全力以赴投入斗争，无条件地、死心塌地地、毫不含糊地跟党走，经受这场残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党总支决定，我们这个年级（班）要紧跟斗争形势，一直干到期末，本学期的功课挪到下学期重新安排。同学们为之热烈鼓掌。

5月22日上午，到中国美术馆参观李家庄团支部学习毛主席著作事迹展。结束后到附近的中宣部宿舍再次拜访洪禹夫妇。他们十分关心我们参加文化革命的情况，详细询问了一番，我尽可能具体地作了介绍。随后，洪禹同志谈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他说，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尖锐性；要打破框框，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要用毛泽东思想为尺子，拿它来衡量一切，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才是正确的；不符合的，就是错的，不管他是谁、地位有多高、名望有多大，都没有例外地要予以批判。我反映：近来同学们都怀疑彭真有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中央还没有点明，具体情况不清楚；你们可以去分析、去思考、去判断。现在摆出的很多材料都说明北京市委有严重问题，报上已公开点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名。你们同学那样考虑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甚至可以说是根据的，大家一定会往那里去想，一定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还很难说，可能同学们想的就是对的，也可能不对。事情真相总有一天会清楚的，等着瞧吧！对此，我表示了疑虑：我真不敢想象这样的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的人会有问题，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回应道：是啊，说起来问题很严重，但也不是不可能，赫鲁晓夫不是躺在斯大林身边好久、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吗？我们这里说的人还没有赫鲁晓夫的位置高呢！高岗也在毛主席身边躺了好久，职位也很高嘛，彭真还没有他高呢！早在高炬、何明的文章发表以前，陈毅同志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提醒大家：“你们在座的各位要提高警惕，赫鲁晓夫就躺在你们身边。”这就指明，在我们这里出现赫鲁晓夫之流的人并不是不可能的。要打破框框，不要被“权威”、“名人”吓住，一到这里就不敢再往前想了，认为××哪能有问题呀！要是这样考虑问题，那么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就太差了，哪能把所有有问题的人都揪出来呀？中央号召大家要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斗争。我又提出：过去许多报告都是彭真作的，看起来调子还不低。洪禹同志回答：赫鲁晓夫有时候调子也

不低。他反复强调，不要被框框束缚住、不要被现象蒙蔽住、不要被“名人”“权威”吓唬住，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他也指出，还是独立思考、自己分析、自己判断好，这比哪一个人告诉你哪一件事是什么样子的都强，都更能得到锻炼、提高。我们就应该在大风雨中锤炼自己、提高自己的识别能力。

### 批判孙泱

5月24日下午，4时30分以后，系里先召开紧急党员大会，后召开全系师生员工大会，系党总支书记葛锡有传达校党委紧急会议精神，向全体教职工戳穿中共北京市委假揭露、真包庇，假批判、真掩护，破坏文化革命深入发展的阴谋。晚上，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声讨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大会。会后，全校沸腾起来了，师生员工忙着写大字报，揭发、批判“黑帮”的反党罪行。真正群众性的、彻底不妥协的反击战开始了。

5月25日，经过昨晚的发动，群众行动起来了，高涨的革命形势出现了。大家口诛笔伐，愤怒声讨反党分子的滔天罪行。面对这种形势，我既高兴，又有些不安。高兴的是群众动了起来，革命声势造成了，这是对反党分子的最大压力，是文化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不安的是对有些现象不能理解，例如：

1. 很多人把北京市委与邓拓一伙完全等同起来，喊出“彻底捣毁北京市委”的口号，这是正确的吗？难道北京市委烂透了吗？北京市委是党的一级组织，提出“捣毁北京市委”，允许吗？

2. 很多人的大字报是随心所欲写出来的，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好多人、好多事是凭空想象或者推理出来的，毫无根据地给人下各种各样的结论。而且怀疑面越来越宽、被指名道姓批判的人也越来越多，彭真是大家集中谴责的一个，很多人说他是大阴谋家、中国的赫鲁晓夫，是骗子手、最大的反革命头子；还有刘仁、郑天翔、宋硕、

张文松、范瑾、郭沫若，都在被揭露批判之列。此外，同学们还点到了高教部、中宣部等部门，怀疑到罗瑞卿、陆定一等人，甚至怀疑到中央书记处、邓小平同志那里去了……乱七八糟，不知哪是真、哪是假，谁是该批判的、谁是不该批判的。这样搞行吗？会不会被坏人利用、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借此咒骂我们党一通？

3. 内外界线不分，党内的事情也拿到外头讲，好像再也没有什么限制了，啥都可以说。这样做好吗？

就是这样一些问题一整天都在我脑子里打转，虽然也照样写大字报，参加大批判，但心里却有点愁闷，不知如何是好。

5月26日晨6时30分，学校召开紧急党员大会，校党委副书记赵德芳传达周总理和毛主席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周总理指示：大字报要分两种，一种是公开的，口径须与报上讲的一致；一种是内部的，可以随便一些。会议也要分两种，党内外分开，党内问题可以通过组织内部提出来，转达上去，绝不能拿到外头去讲。这样做对党、对国家都有利。运动要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搞过了头。文化革命一定要搞下去、搞到底，但要采取妥当的形式，要先把道理讲清楚。毛主席指示：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但这又不是三天两天所能解决的，而是个长期的战斗任务，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开大会声讨、漫画、拍电影、拍电报等形式不要搞，我们可以开座谈会、写大字报、写文章揭发批判。我觉得总理、主席的指示来得太及时、太中肯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才不致于出乱子。像前天晚上和昨天那样搞，不出两天，非出乱子不可。

6月3日，接父亲5月29日信，说他于5月14日率省巡回医疗队到顺昌县埔上公社巡回医疗，在那里设立省流动医院，为时半年。7月5日又接父亲7月1日信，说他们流动医院全体工作人员遵照省委决定，于6月23日回榕参加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运动。算起来他们在乡下工作了40天。

6月8日清晨，原我校经济系研究生江春泽等七人在校西边食堂（经济、语文、新闻、

党史、国政、档案诸系学生食堂) 门口墙上贴出一张揭发经济系主任宋涛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大字报。随后，揭发校系各级领导问题的大字报如雪片般迅速贴遍全校各个角落，一改此前只涉及北京市委、中宣部等外部问题的局面。晚上，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校党委副书记孙泱作报告（郭影秋在5月下旬被中央任命为改组后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校党委由孙泱主持）。他欢呼我校文化大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勉励大家乘胜前进，再挖、再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代表校党委揭发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对我校工作的影响，号召全体师生员工进一步清除这条黑线的影响。

6月11日上午，语文系研究生马畏安等人贴出抨击孙泱6月8日晚报告的大字报；中午，共同政治理论课教研室教师麦农等人写大字报支持马畏安等人的意见，指出孙泱的报告是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翻版，是一个大骗局。

6月13日上午9时许，办公大楼墙上贴出校党委副书记崔耀先、赵德芳，监委书记凌静（郭影秋夫人）三人联名写的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我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坚决站在革命派这一边，同孙泱展开斗争。随后又传出北京新市委决定停止孙泱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消息。同学们由此断定孙泱是黑帮分子，大家激愤起来，由几个人领头，成百人跟随冲进孙泱家里，把孙泱揪到大操场来(开头还有人给他戴上高帽，后被摘下)，自发开了个斗争会。后来崔耀先等人赶来，主持了这个会，宣布停止孙泱的一切职务，校党委由崔耀先主持。许多人发言揭露孙泱的罪责，群情激昂，把孙泱搞得很狼狈；也有人浑水摸鱼，会场秩序混乱，不好掌握。后决定下午有组织地开大会斗争孙泱。下午3时在文化广场召开全校批判、斗争孙泱大会。孙泱被揪到台上，许多人上台揭发、批判他。大会整整开了三个半小时，孙泱也被指令站了三个半小时，散会后还如同挨斗的地主分子一样被押下去。孙泱是什么问题尚不明确、更未定性，就这样七批八斗，好吗？我心有疑虑。这是我校文化大革命中任意斗争各类人员的开端。



## 工作组进学校

6月16日上午，参加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刚进校的工作组与大家见面，组长赵一平作动员讲话。此前两天，6月14日，新组建的北京市委派来以海军政治部副主任赵一平为组长的工作组，领导我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26日下午，给洪禹同志写信，着重向他请教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也可一分为二的问题。社会上和校内揭发、批判所谓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声势越来越大、调门越来越高，关于毛泽东思想也可一分为二的观点被纳入批判的范围，被斥为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话。我有点心慌，担心涉及到曾经谈论过这个问题的洪禹同志。于是，写了这封信。我把日记里追记的洪禹同志去年7月18日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抄上，请他审查是否有误，并请他进一步谈谈认识。6月29日中午收到洪禹同志（6月28日）的回信。这封信集中回答了我提的问题，将一年前关于这个问题谈话的内容系统化、条理化了，从而更加深刻、更有说服力。这封信使我坚信洪禹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无可指责的，也使我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此后再也没有犹豫、摇摆过。

7月10日下午，前往中宣部拜访洪禹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宣部被指为“阎王殿”，遭到万炮齐轰、处于瘫痪状态之际（进出自由，无须如以前那样严格盘查），我拜访了洪禹同志。他就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发表了精彩的谈话。他说，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既要勇敢、敢于彻底革命，又要理智、善于冷静思考一切问题，做智勇双全的革命者，既不当胆小鬼、逃兵，也不做狂徒、莽夫。他指出，首先要有彻底革命精神，敢把皇帝拉下马，没有这一条，就失去革命者最基本的品格；其次要冷静，要实事求是，要讲究斗争策略，不能蛮干、瞎撞，更不能毫无根据地瞎说一气，瞎说一气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他说，当前的形势很好，但情况又很复杂，各式各样的人都跳了出来，争着表演一番，各种人都在表现自己。被揭发的人固然在亮相，揭发别人的人同样在亮相，同样在经受考验。一定要从党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一定要保

持清醒的头脑，识别真假。要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活的毛泽东思想。他谈了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认识。他说，为了把一切牛鬼蛇神通通揪出来，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揭盖子，但是不能认为所有被揭发、被批判的组织和个人都是坏的。黑线影响很深，许多人都执行了；但究竟是怎样执行的，要具体分析，绝大部分人是盲目执行的，是无意识跟着走的，只有极少数人是自觉地、死心踏地执行的。中央已有定论，95%以上的党组织、党员是好的，是愿意革命的；陶铸同志来（刚任中宣部长）后也说中宣部的大部分同志是好的，并没有说都是坏的。我们虽然在中宣部，但对黑帮分子的内幕也不清楚，都被蒙在鼓里，叫“内蒙古”。过去很长时间都是从组织观念的角度去执行错误路线的，这样一些问题当然也要检查、清理，但跟黑帮分子无论如何是不一样的。斗争使我认识到，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把握两条：一要有组织观念，二要用主席思想这个最高指示来衡量一切，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坚决执行，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坚决抵制，不管是来自哪一级组织的。这两条缺一不可，后一条尤为重要。以往最缺乏的是后一条，常常盲目服从组织，也就上了那些个人野心家、大党阀的当。这是个严重的教训，应该认真汲取。洪禹同志还谈到，对一个干部应当历史地、全面地看。一个干部，他说过许多话，做过许多事，有的还作过报告、起草过文件、发表过文章，甚至出了书，这些就是考察他的依据。应当根据这些东西、用他的所作所为来评判他。他充满自信地说，参加革命以来没犯过什么错误，没受过什么处分。自己写的许多东西，现在回过头来审查，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头的，还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应当经得起运动的审查，经得起党的考验。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7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江青、陈伯达、康生昨晚在北大辩论会上关于工作组执行错误路线、建议撤销的讲话，以及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关于市委决定撤走北大工作组和其他学校工作组的讲话很快传遍我校，我校工作组当即瘫痪、不起作用，校内掀起了批斗所谓“牛鬼蛇神”的高潮。晚饭后，各系同学纷纷行动起来，前去揪牛鬼蛇神出来戴高帽、游街、开斗争会；八时半以后集中到文化广场，把包括孙泱、崔耀先、赵德芳在

内的校、系主要领导五、六十人揪到广场舞台上，自发开了一个大规模的斗争会，让每个被斗对象依次向台下群众作自我介绍，承认自己是牛鬼蛇神、黑帮分子，着重叫孙泐交待问题。斗了一个多小时，又把各系、各部门的被斗对象分到原单位，由原单位群众处理。我系集中斗了葛锡有、戴卓、徐景秋、何非四人，葛锡有态度恶劣，向他质证任何事情，都回答“决无此事”，被斗的时间最长，折腾到次日凌晨2时多才收场；其他三人态度稍好，被早点放回去。这次大批斗有若干明显的缺点：斗的人太多，打击面过宽；违反政策之处甚多，如戴高帽、戴纸篓（甚至戴厕所里装粪便纸的纸篓）、顶痰盂，推、拉、踢、逼（逼他们承认自己是“黑帮分子”，把所有被斗对象都当作“黑帮分子”），等等。我觉得这些做法是不妥当的，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但又认为这是大规模群众运动难以避免的缺点，是可以原谅的。

### 辩论郭影秋问题

7月28日，在无政府、无领导的状态下，校内掀起批斗所谓“牛鬼蛇神”“黑帮分子”的新高潮。一切由学生作主，想揪谁就揪谁，要斗谁就斗谁，愿意怎么整就怎么整，到处有游街，有斗争会，有批判会，造成一股短暂的恐怖气氛。昨晚行动中的缺失不仅重现，而且大大加剧了。最大的问题是打击面过宽，据不完全统计，半天多全校斗了200多人，哲学、财贸、计统每个系都斗了30余人，把系领导、教研室负责人、一般工作人员、政治辅导员等大大小小的干部通通揪出来游街、批斗，一串连着一串。哲学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在一片空地上批斗系里的头头脑脑，被批斗对象站在板凳上，群众大多站地上，围成一圈；给我班上过课的逻辑学教师李萌拿了一张靠背椅摆在靠前处，坐在上面，翘着二郎腿，脸带微笑，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不知谁喊了一声：这个翘二郎腿的人不是好人，几个学生就冲过去把他架出来批斗，他一时惊慌失措，差点哭了出来。总之，任何一个教师、干部让学生感觉不顺眼，就有被批斗的危险，颇有些人人自危，许多教师、干部提心吊胆，

深怕什么时候被莫名其妙地拉出去批斗。此外，变相体罚、侵犯人身自由，逼、供、信等违反政策的做法更普遍了。比较起来，我们系做得稳妥一些，只斗了葛锡有、戴卓、徐景秋、何非四个系领导，以及据说是“老右派”的教师高放，方式也文明一些。

7月29日晨，前往中宣部拜访洪禹同志。由于校内关于第一副校长、党委书记郭影秋是革命领导干部还是黑帮分子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昨天又传来康生在内部讲话中点到郭影秋与“二月兵变”有关的消息，更给争论火上浇油，今天凌晨部分同学把郭影秋从新市委揪回学校斗争。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郭影秋，我把握不准，遂于早晨6时许匆匆赶去请教洪禹同志。7时到达，洪禹同志刚起床，正在收听广播，他认真听我介绍了校内争论的情况，尔后谈了看法：他倾向于我此前的认识——郭影秋同志是个犯有错误的革命干部。对外面传的康生同志那些话要作具体分析，要搞清楚康生同志是不是那样说的，有没有误传；即使康生同志确实说过郭影秋同志与“二月兵变”有关，也不能说明郭影秋同志就是黑帮。可能有几种情况：一是郭影秋同志知道要在人大驻军，但不了解内情；二是郭影秋同志了解“二月兵变”的全部情况，已上报中央；三是郭影秋同志了解“二月兵变”的有关情况，但是犯自由主义错误，没有揭露；四是郭影秋同志既了解“二月兵变”的有关情况，又参与策划阴谋……康生同志那样讲可能是要证明“二月兵变”确有其事，并不是说郭影秋同志参与了这个阴谋。你们可以独立判断究竟属于哪种情况。用自己的脑子分析、判断，这是最根本、最可靠的方法，也是最能磨炼人的。遇事自己不动脑子，只看人家的态度，坐等上级的指示，上级点头你跟着点头，上级摇头你也跟着摇头，这种态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针对我希望他帮助向陈伯达同志打听对郭影秋看法的请求，洪禹同志指出，不要指望从他那里得到明确的结论。一方面，可能他也还不清楚，不能下结论；另一方面，就算他心里有了底也不一定告诉我们。在党作出正式结论以前，个人是很难表示什么态度的。他说，你只要有比较多的党内斗争经验就会明白，一个严肃认真的领导者，对某一件事情在把它的全部真相搞清楚以前，是不会轻易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的。他希望我如毛主席经常教导的那样，掌握大量的乃至全部的材料，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作出自己的判断，

然后拿它与中央的指示对照，如果相符合，就坚持、执行；如果不符合，就赶紧改正，这也是很好的锻炼。洪禹同志这一番充满辩证分析的谈话，尤其是他的实际行动，提供了客观、具体、全面认识人和事的极好的范例。在这次谈话中，洪禹同志还就近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一事发表了看法。他说，撤走工作组，并不意味着工作组本身是坏的，而是说这种形式不适应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有碍于运动的开展。撤销工作组可以更加放手地让群众起来闹革命，打破一切框框，彻底揭发问题，更有利于革命。这是基于对群众的最大信任，是要让群众（特别是革命小将）更好地磨炼自己，更好地革命，是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目标着想的。与此相关，洪禹同志谈到如何理解党的领导问题。他说，哪里按毛泽东思想办事，那里就有党的领导；哪里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那里就没有党的领导。不管他是不是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只要他按照毛泽东思想去率领群众前进，他就是群众的领导，他就体现了党在那里的领导作用。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力争成为运动的先锋。他还说道：执行党的政策和充分发动群众是一致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矛盾。我于10时半左右回到学校。

同日上午11时许，参加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驻校工作组宣布了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工作组组长赵一平表示要虚心接受人大革命师生的批评，相信人大革命师生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赵一平讲话后，北京市委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陶鲁笳、委员张经武上台与大家见面，并分别讲了话。张经武的军人气概和自我介绍，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一走上主席台中央便说：我，张经武，弓长张，经武，就是经营武装。引得全场大笑，把宣布撤销工作组带来的沉闷空气一扫而光。

8月2日夜，参加在我校南大操场举行的关于郭影秋问题（是黑帮分子还是革命领导干部）的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辩论。邓小平、陶铸、吴德、陶鲁笳、张经武等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人出席，外校、外地旁听者甚众。晚8时许，辩论开始，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主持。双方旗鼓相当、针锋相对，一方断言郭影秋是坏人、是黑帮头子，另一方坚称郭影秋是犯了错误的左派，争论激烈、言辞犀利。我班女



同学吴廷嘉也无所畏惧地跃上台，当着邓小平、陶铸等领导人的面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用她深入校内工人和苏家坨贫下中农之中调查获得的大量材料证明郭影秋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优秀的领导干部，批驳攻击、诬蔑郭影秋的言论，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辩论进行到深夜12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且越争越激烈，越辩越对立。主持者宣布暂停争辩，回去继续准备，改天再辩。邓小平和陶铸相继讲了话。

邓小平说：我们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来向你们取经的。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提出的，这是一件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决策。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件新的事情，我们也没有经验。这个问题确实是老革命碰上新问题。我们在文化革命发动之后，搞了一个派工作组。派工作组这件事看来在开始时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应该很快地感觉到工作组这种形式阻碍群众运动。实际上群众能够自己革命，有能力、政策水平、思想水平，能进行好的。这些我们感觉得迟了，这点，我们在北京的中央同志就是犯了错误的，错误在我们这些人是经常有的，同志们对我们提出批评完全应该，应该经常批评。这个对帮助党中央工作同志、市委工作同志、各级工作同志是很重要的一条。派工作组这件事情，我这里要重复说一下，这是新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派的。这点要负责任，我们中央在北京的同志要负主要责任。现在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新市委又决定撤销工作组。撤销工作组又干什么呢？就是要同志们自己干革命，就是建立在相信我们大中学校学生、大中学校的教师职员工人同志自己能把文化革命干好，建筑在这个相信上面、这个基础上，作出这个决定。对于工作组也要说一说，情况不同，工作组仓促上阵，一定有很多错误。今天同志们没有接触这个问题。我相信以后会接触这个的。工作组我们没有交待他们政策、方针、工作方法，仓促上阵，没交待好，这方面属于我们的责任。至于他们在工作中有什么错误，同志们实事求是加以批判、加以检查。今天只接触一个郭影秋同志的问题。今天这个辩论会我感到开得很好，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因为这件事使我更加相信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是正确的。因为工作组这个形式阻碍群众的自觉革命。撤销了工作组，今天看出不管哪方面的发言，都有相当的水平，证明能够自觉革命。不管对的

或错的，经过争论，经过考验，最后总能够找到一致的意见，可以得到胜利。当然嘛，工作组撤销，现在的形势是这样一个形势，摆在我们学校面前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敢于革命，一个是善于革命。敢于革命，我今天很高兴，我看同志们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意见，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革命的，是革命的同志，敢于革命的，我们很高兴。善于革命，我们目前已经没有工作组了，学校师生员工同志们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来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这件事我们没有经验，同志们是不是已经有经验了呢？我看同志们正在创造经验，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我相信同志们能够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创造出很好的经验，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这场革命是不容易的，正像《人民日报》社论说的，是接触每一个人的灵魂的革命。这个革命的任务，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一斗二批三改。斗什么呢？就是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批什么呢？批倒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改什么呢？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我看我们今天的发言还只是在一个“斗”字上，只是在这个阶段上斗。是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个工作都斗好了斗完了呢？是不是只有一个郭影秋的问题呢？现在又提到一个孙泱问题。是不是只有这个问题呢？同志们要思考，要研究。斗也好，批也好，要选定目标，选得准，才能打狠，才能打好。这样的问题，比如人民大学，我们中央是无能为力的，进行这个斗争，我们帮也帮不了你们的忙，靠你们自己。批比斗资产阶级当权派更困难一些，而改不比批更难，也不比它更容易。摆在同志们面前的是很艰巨的工作，要同志们自己去做，我们没有经验，我们要跟你们学习，你们创造了经验给我们学习，我们做为领导的责任，就是要把群众创造的经验加以概括来指导一般，就靠这个，我们没有什么本事，离开了你们，我们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相信同志们能够自己创造经验，即敢于革命这点有了，又善于革命。至于郭影秋同志，那天刘少奇同志在会上讲的，对于一个干部多少年的评价，提他种种意见都是有的，但你们学校本身不能给一个同志做总结论。这个问题中央和新市委会从全面的角度考虑的。但是郭影秋同志在你们学校的问题，只有你们有发言权。中央、市委评价郭影秋，将来的问题也根据你们这方面的材料，这是一个重要方面的材料，也要根据这个。同学们辩论这个问题是

应该的，应该继续辩论。不是刚才说还要继续开会吗？辩论看来也不只是这样的大会，恐怕要更细致地研究问题、更冷静地分析问题，小的辩论会，另外大小会相结合方式恐怕是必要的，同志们考虑一下。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接着第二阶段就是批，第三阶段就是改。很巨大的工作，又没有工作队，学校又没有党委，现在学校马上恢复党委是不适当的，那么办法是什么呢？办法就是学校的师生员工产生一个领导机构，正如市委的通知里所讲的，你们的学校应该由全校的师生员工代表会议产生一个全校的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小组，班也有革命小组。我听说你们学校还没产生全校的领导机构，我和陶铸同志、吴德同志商量一下，建议你们先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这个筹备委员会的委员看来意见有些不一样，这个不要紧，采取协商嘛！同反面意见的人协商是很必要的，没有这个办法是不行的，要协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无记名投票，选的不适当，再改嘛。总之，我们建议比较快地产生一个全校的筹委会，这个筹委会召集全校师生员工代表会议，选出正式的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这个运动。我相信用这个方法会使这个运动进行得更有秩序，更有计划，各种经验更能及时地总结。只是这么天天地辩论过来、辩论过去，没有这么个东西，时间总是要拖长些，这个不利，因此我提出这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此外，其他的问题停一下，陶铸同志还要讲一讲。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刚才有许多条子，问这个“二月军事兵变”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因为当时有些军队要驻在北京，分配一些营房，后来军队同志感到住学校里，军队和学校混起来也不好，所以只是这么一件事。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不算一回事。

陶铸说：刚才小平同志讲了话了，时间已是深夜了，快到一点钟了。我同小平同志来，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叫我们去各个大学向同学们学习，向同学们问好。我讲话的中心，一句话，我们确实不是谦虚，是向你们学习。确实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平同志算是老革命了，我是中等，不算老，也是碰到了新问题。三反、五反、反右斗争也搞过，四

清也遇到点，但文化革命没搞过。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斗二批三改。第一是斗，斗就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民大学到底斗谁，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才来北京两个月，你叫我斗，我知道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呀？我不知道。你叫我说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说不清楚，全靠革命的大辩论。辩论就是选斗争目标嘛！到底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你们能解决这个问题。郭影秋同志我不认识他，只见过他一面，他的问题我不清楚。他来到人民大学三年多，究竟干了些什么？你们清楚嘛，你们辩论嘛！郭影秋同志的问题你们知道，充分地揭嘛，是什么就是什么嘛！你们辩论出来他是黑帮，你们就斗嘛！我们支持你们揭他的问题。中央、新市委已撤销了郭影秋同志市委文教书记的职务。刚才有人递条子，说我们的态度不明朗。同志们，凡是打黑帮的，我们坚决赞成，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斗黑帮，有多少黑帮，你们都斗，我们坚决支持。不管哪一个同志讲，我们上台鼓掌，下台鼓掌，都一样。不要看我们的眼色。至于说工作组来到你校，如果对你们进行政治迫害，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揭。有问题可以跳上来讲，这次跳不上，下次可以跳。斗争不要看眼色，就是靠毛泽东思想嘛！我们没有把郭影秋的问题弄清楚，要由你们做结论。将来你们做出结论，我们再鼓掌嘛！斗争完全靠说理，靠摆事实。下一段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更要靠你们了，我们更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没有在人大唸过书，哪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也不清楚，只有靠你们批。人民大学到底怎么办？据说人民大学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过去人民大学领导没搞好。如何把人民大学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大学校？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相信一定能够建立起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大学。我们是没有本事的，我们是真心实意的，不是讲假话。第二，讲讲辩论。四清运动没有文化大革命搞得深，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建设社会主义、建成共产主义的可靠保证，它对于我们国家和世界革命都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有这样大的威力呢？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靠的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靠大民主。不这样发动群众，旧的制度绝不能被彻底摧毁。人民大学几千人认识不统一怎么办？就是靠辩论嘛。辩论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形式。今天的辩论会好就好在你可

以驳我，我也可以驳你，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办法。但要保护少数。辩论时不保护少数，辩论就不会展开。少数人也有他的观点，也可以让他发表嘛！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靠这个办法嘛！大家能认真发言，都能把观点拿出来，郭影秋同志的问题一定能辩论清楚的。真的不能说成假的，假的不能说成真的，是黑帮成不了左派，是左派成不了黑帮！不同意见能够一致。至于少数人的意见统一不了，可以保留，不要强制人家。保护少数，就是让人家发言，不要轰人家。有的同志轰也轰不下去，这是大无畏的精神。我就不行，轰得厉害，我就讲不出来了。这一点，我要向你们学习，学习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同意见不要让人家检查，容许人家保留意见。逼着让人家服，人家心里不服，压服是不行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应迅速建立起来。工作组已经撤走，一切权力都要归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委员会选不出来怎么能行呢？可以通过协商，多数照顾少数嘛！少数意见可以保留。绝大多数人是想把革命搞好的，建议你们明天再开会，再协商，快把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搞个临时委员会也好嘛！不好也可以推翻嘛！苏联过去搞过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行，再搞个十月革命嘛！

辩论会于3日凌晨1时许结束。

8月18日上午，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百万军民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即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我们班的沈大德同学无意中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大会工作人员到群众中来找一些人到前面去，沈大德以为是去当标兵，自感到个头比较大，能够胜任，便自告奋勇前去），见到了毛主席，还同毛主席握了手。下来后兴奋万分，激动地向同学们讲述在城楼上的见闻。

8月20日下午，参加在大教室举行的红卫兵组织成立大会。200多位“红五类”报名者参加大会，其他革命师生旁听大会，外校的红卫兵代表列席大会。大会宣告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后改称“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前后，应邀参与同班同学张联瑜、张锡林、许寿明、刘启用等人发起的成立红卫兵组织的筹备活动，经过几天酝酿、谋划，基本就绪。

同日夜，参加在我校南大操场由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组织的关于郭影秋问题的第二次大辩论。我校革命师生员工、苏家坨 600 多贫下中农和外校、外地各类人员共 1 万余人参加；陶铸、陶鲁笏、张经武等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出席。双方争论很激烈，持续时间很长，直到第二天（21 日）凌晨 4 时，会场秩序很不好，议论纷纷、乱七八糟，出现了台上一方的人发言、台下另一方的人起哄、大喊大叫，双方当场争吵起来的乱象，属保郭一方的苏家坨贫下中农和校内工人的情绪尤为激烈。陶铸最后讲话时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辩论要有个气氛，现在这样情况我觉得难以辩论。毛主席要求文化革命要有很好的辩论，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保护少数，即使少数是错误的，也要让他讲下去。不然怎么能辩论起来呢？今天晚上我不满意。对于贫下中农支持（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我很高兴。如果你斗地主这样，我也很赞成。但要让人家把话讲完，不管对的也好，错的也好，因为这个是辩论，是毛主席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大家都愿意听毛主席的话嘛。那么我们是真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假听毛主席的话呢？我想，贫下中农、工人同志是最听毛主席话的。辩论要有个气氛，就是赞成的意见让他讲？辩论嘛，就是有不同的意见才辩论嘛，如果意见都是一致的，还要辩论什么？我们不是讲民主吗，讲民主大家都有讲话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是反革命公安局抓去了嘛！在这里都不是现行反革命犯，都有讲自己意见的自由。要辩论就要有个气氛，有个环境，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能够讲完，讲完他们的意见，使辩论能很好地进行下去。为此，我要求：1. 大字报还是要搞，充分揭露。大字报揭谁都可以，揭什么问题都可以，你揭我的，我可以揭你的，你贴一张，我也可以贴一张嘛！绝不能因某张大字报讲的郭影秋是革命左派，我们就说他是保皇党；也不能说反对郭影秋的、讲他是黑帮的就是反革命，这个不对。他认为郭影秋是革命左派，可以嘛，他有他的看法嘛！另一方面，也有同志讲郭影秋是黑帮，也不要讲人家反对郭影秋，说郭影秋是黑帮，他就是反革命，这样人家就不能提意见了嘛！我们是人民政府，只有四类分子没有权利（发言）嘛。因为郭影秋的问题正要大家来议论，议论，有人这样看，有人那样看，完全允许的嘛！所以要辩论，就要创造很好的环境。要允许大家自由贴大字报，讲自己的看法；你



不同意，你可以贴大字报。不要随便讲拥护郭影秋就是保皇党，反对郭影秋就是反对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对新市委，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这都不对，是错误的。今天，只能誓死保卫党中央，只能够誓死保卫毛主席，除此以外，任何人都不能起来保卫。你保卫了，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保卫了，这个是左派，那个是左派，你还揭什么呢？我们搞过“四清”的嘛，大家都是四清干部，那你还有什么“四清”的必要呢？“四清”我们怀疑干部，面比较大嘛，搞的结果，有的是小毛病，就解放了嘛。我是搞过三次“四清”的，那你“四清”到一个大队，一个生产队，你说干部都是好的，没毛病，那你“四清”就不用搞了，还搞它干什么呢？所以，第一，我赞成搞辩论，搞十天，不要搞久了。（指我校关于郭影秋问题的辩论）第二，要有个很好的环境，让大家充分把话讲出来，完全民主。现在，毛主席讲，学生可以上街，大字报可以贴街上去嘛！我们的国家工人是很觉悟的，农民是很觉悟的，学生是很觉悟的。2. 辩论要取得双方一致。辩论，一个就是大会辩论，要一对一（发言），这是保护少数的好办法。否则，你又讲拥护毛主席指示，坚决执行十六条，又不赞成一对一，又不保护少数。大会我赞成，你们是多数嘛，既然是多数，真理在你们手里，你们怕什么呢？少数就是没有理嘛，没有理由你怕啥？为什么不可以一对一（发言）呢？假如开小会，大会不能多开了，如开小会，我要跟你辩论，那我先挑战：我要同你辩论，你同不同意？辩论什么问题？多少人辩论？我来几个，你来几个，上午我当主席，下午你当主席。如果不这样，我拒绝同你辩论。不然后人少，你这里一班来辩论，那里一班来辩论，车轮战一样的，那可吃不消啊！辩论要双方协商，要统一，要采取双方同意、取得一致意见的辩论。坚决按十六条办事。关于郭影秋，陶铸说：就现有材料看，郭影秋同志不是黑帮。但是以前同志们认为郭影秋问题是严重的，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曾有个“二月兵变”问题。“二月兵变”这个事实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也要讲，根据现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郭影秋同志也不能说他是革命左派。为什么呢？郭影秋同志，你们贫下中农很熟悉，一年多的朋友了。我们更熟悉，从抗日战争到现在二十多年了，郭影秋同志的工作经历，各方面我们党是清楚的。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的表

现是不错的。但解放以后，特别是最近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是有问题的。市委为什么要撤销郭影秋同志的职务呢？就是因为他犯了错误。原来他是代表华北局参加文革小组的。正因为他是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在师大工作搞得不好，没有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没有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方针，在人民大学最近一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不是我们所要求的那样。有些同志讲，市委没让他当书记，让郭影秋同志回来，是因为人民大学工作很忙，要他回来领导人，不是这么回事情，是他犯了错误。我不能撒谎，我是有什么讲什么。“二月兵变”没有，但郭影秋确实犯了错误，所以才撤销他书记的职务，因为他不能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能作为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来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因此，撤销他市委文教书记的职务，难道这样能说他是革命左派吗？根据事实，就现有材料来看，现在不是黑帮，这是第一；第二，根据文化革命中的表现，不能算革命左派。既然不是黑帮，那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管二类、三类，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不是革命左派，但他不是黑帮，比上不足，总还不是黑帮，比下有余嘛！陶铸建议苏家坨贫下中农不要参与人民大学校内问题的辩论。他说，他们辩论学校的事情，贫下中农你们也不太清楚，我也不清楚。学校的事情，只有学生、教员、职工他们清楚。学生他们上课嘛。所以毛主席反对派工作组到学校去就是这个道理嘛。你是空军、海军、机关的，一没唸书，二没教学，三没在校当工人，你怎么能够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怎么能批资产阶级“权威”？你怎么能改革教育制度？不了解嘛！所以辩论学校的问题还是让他们学校师生员工去辩论，我也不参加，因为我不懂，事情不清楚嘛。他们大学要自己挑选自己的领导，重新挑选自己的党委书记。你们辩论挑选生产队长时，人大开一两千学生去帮助你们挑，也挑不好的！陶铸最后谈到红卫兵问题。他说，人大红卫兵是合法的，整个北京市、全国现在都要成立红卫兵。成立红卫兵是党的一个政策，把红卫兵变成我们青年的一个武装组织。如果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打来时，我们有坚强的红卫队，城市学校有红卫兵，农村有基干民兵，将来工厂里也可能要搞红卫兵、民兵，全民皆兵，美帝国主义要欺负我们，侵略我们，就把它彻底消灭。因此，红卫兵应成为团结广大革命同学的组织。我不赞成在学校成

立贫下中农、干部子弟协会，我赞成红卫兵，因为大学贫下中农、干部子弟是不少的，但是，学生三年四年就要毕业。农村贫协是个权力组织。同时还有大多数同学。要讲阶级成份，阶级成份是第一的，但不是唯一的；既然不是唯一的，就是要看表现，要重在表现。这是主席的语言。……是怎么讲的呢？第一是成份，第二是反对唯成份论，第三是政治上表现好的，我们要团结他们。这是全面的，这是毛主席的语言。讲重在表现不讲成份第一是错误的。人大有两个红卫兵，我赞成你们开联席会议合起来，就是要以前这个为主。……我看两个不太好，既然都是红卫兵，为啥红不到一块儿呢？我们（保郭派）认为陶铸的这番话基本肯定了对立一方（反郭派）的意见，否定了我们一方的意见。我方人员大为恼怒，一些积极分子当即酝酿向中央告陶铸的状。

### 到外地大搞串联

8月27日上午，与班上同学李金海、丁雪荣、宋柱修、杨秉文离京乘免费火车南下串联。28日中午抵上海，住复旦大学教学楼303教室。先后接待了上千名大、中学校学生，向他们介绍首都文化大革命情况，鼓动他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李金海、杨秉文应邀到文化广场参加上海市委召开的北京南下串联革命学生大会，据介绍，北京学生同市委和曹荻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声势很大、反响强烈；首先在复旦大学大字报栏、尔后又到上海市委贴出“炮打上海市委”的大字报，引起很大轰动；宋柱修到上海文建中学宣传文化大革命，受到围攻，直至深夜才回到住地；我与丁雪荣应邀到上海中建锅炉厂（现称“东方红锅炉厂”）及其半工半读红专学校串联，受到那里的革命青年、学生、工人的热烈欢迎，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为我们打印了一批宣传材料），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9月3日上午离开上海前往福州，4日中午抵福州站，被接到仓山的福建师院中文系安顿。参加了5日下午北京来榕串联学生会同福建学生在福州人民体育场召开的揭发批判大会，揭露福建省委、福州市委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持续时间很长，夜9时以后，把叶

飞等省、市负责人找来，并责令叶飞几次表示态度。期间，发生了所谓“工人、农民殴打福建日报社造反派”事件，使与会学生的愤怒情绪达到顶点，一万多名学生走出会场上街游行，高呼“炮轰省委、炮打叶飞”“罢叶飞的官、撤叶飞的职”等口号，震动榕城，折腾到次日凌晨4时许才收场。利用晚间和在福州多呆一天的机会，几次到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即省人民医院）看望父亲，碰巧母亲和弟弟俊辉在此，难得见面，都很高兴。长辈刘祖丕、刘荣喜、林元成先后来访，谈话的主题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及个人感受。刘祖丕同志的认识最深刻，他说，文化大革命，一是毛泽东思想的普及运动，经过运动，可使毛泽东思想大大深入人心，成为每个革命者的行动指南；二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三是破除一切旧风俗、旧习惯，完成最艰巨的任务。他表示，从革命利益出发，个人受点委屈没关系，即使戴高帽、被斗争也应该愉快接受，不能有怨言。他勉励我放开手脚、大胆地干，什么也不用怕，什么也不用顾虑，只想到一条——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他风趣地说，要跟在你们后面前进，要向小将们学习。他的话给我很大的鼓舞。我还同就读于福建师院政教系的泉一中校友黄印献、俞江东见了面，畅谈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体会。丁雪荣、李金海、宋柱修、杨秉文于7日晚离榕前往广州；我滞后一天，8日晚离榕，10日早抵广州，即赶去暨南大学教学楼四层与他们会合。在广州呆了3天，参观了毛主席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在讲堂前合影留念，这是这趟南下串连拍的唯一照片；瞻仰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参观了黄埔港，看到了我国自行制造的“光华号”大客轮（此客轮曾到印尼接运华侨同胞）；还渡江到黄埔岛，参观了陆军军官学校旧址，包括后来仿造的校门、鲍罗廷楼、总理楼，以及其他文物，如孙中山旧居、孙中山纪念碑、战斗英雄林文虎烈士墓、海上英雄艇“先锋号”等。由于广州大、中学校学生大多外出串连，学校比较冷清，我们一致认为这儿无事可做，决定12日离开，宋柱修去老家山东，我们四人前往南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参观。五人一起乘12日夜的682次快车离开广州，于13日下午抵株洲，宋柱修继续前行，我们四人下车，转乘火车又汽车，于14日上午到达南昌市郊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我们同该校政治理论班和政治文化技术班的同志座谈，听他们介绍

共校的情况及自身学习、劳动的情况，参观了共校陈列室。这个陈列室面积不大，展品不多，却较好地反映了共校的鲜明特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培养能文能武、又会拿笔又会劳动的普通劳动者。陈列室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1961年7月30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共校的题词。这儿的教职员和学生正忙着准备明天进京串连，我们不愿意过多地打扰他们，便于下午4时多返南昌，并乘当晚的16次特快列车离开南昌回北京。16日上午抵西直门火车站，南下串连到此结束，历时21天，行程14640多里。

9月16日，午间回到学校。我们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张贴“炮打上海市委”大字报的事已传到校内，一些熟悉的同学批评我们“搞错了方向”，引发我们深思。晚饭后，伍连连拉我出去谈话，除说我们“在上海搞得不怎么样”外，介绍了许多情况。据她说，近一个时期出现了多起乱批斗、乱抄家事件，闹得很凶、很不正常，好多真正的老革命、左派的家也被抄了。8月24日至9月上旬，对外联络部掀起一股反对她爸伍修权的恶浪，一小撮别有用心者胡说伍修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物，叫嚷要搞掉伍修权的一切政治资本；一部分人不明真相，捕风捉影跟着写大字报攻击她爸，几种人纠集在一起，妄图把她爸打成“黑帮”。紧接着是抄家，一大帮红卫兵涌进她家，声称要扫“四旧”，没有“四旧”就扫“洋货”（伍修权同志经常出国，有一些外国友人送的礼物），把她家的东西翻了个遍。她爸以极大的耐心和宽广的胸怀对待此事，主动把东西拿出来让他们检查，把所有礼物都搬到客厅，准备让他们“扫去”，没有一点厌烦情绪。这事被上面发现了，刘宁一（时任中联部代部长）当即打电话过来严加制止，把她爸请去“开会”，令红卫兵立即退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爸离家时还十分客气地对那些红卫兵说：我现在有事得马上出去，你们以后有事还可以再来。没有埋怨、更没有指责红卫兵们，表现了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对群众运动的热情支持、对幼稚无知的青少年的谅解和爱护。有些工人参与了“抄家”，看到她爸的作风那样好，住所那么简单、朴素，深受感动，撤出后连忙写大字报表示要“向革命老前辈伍修权同志学习！”同时表达歉疚之意。这事闹得很大，直至闹到中央、毛主席那儿，主席很不满意，在一次会议上批评道：怎么搞到伍修权那儿去了？这个方向不能

算对吧！这事到此才算完了，伍修权同志经受了一次考验。伍连连认为这样乱斗乱抄很不好，容易被坏人钻空子。我完全赞同她的意见。

### 胡锡奎被揪回来

9月21日，《毛泽东选集》简体字横排版第一卷开始发行。我和“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10多位战士于上午7时50分乘学校交通股装饰的彩车到海淀区人委会书库领书；8时30分左右，装着1500册宝书的彩车来到校门口，从这里到文化革命广场（原称“文化广场”）几百米的马路两旁挤满了夹道欢呼的革命师生员工，千百只紧握《毛主席语录》的手一起向彩车上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挥舞致意，向我们手上捧着的《毛泽东选集》致意，千百个声音汇成一股洪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彩车来到广场，革命师生员工很快聚拢过来，开了一个简短隆重的庆祝大会。会后立即发行。由于数量不多，决定先卖给外地来的中学生；近午才通知我校学生也可以买，我立即奔向广场买来一册，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9月22日，我校原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胡锡奎被从西安揪了回来，今晚在文化革命广场举行斗争会，声讨他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由于准备不充分、材料不确切，打得不准，并没有把胡锡奎镇住。

10月1日，参加天安门广场国庆17周年庆祝活动。我和我系的一些同学被安排为维持会场秩序的标兵，昨晚11时从学校出发，12时许到达天安门广场。我们负责公安部到历史博物馆后头的广场地面，是游行队伍第九列的标兵。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后，群众游行队伍即开始进场，川流不息，直到今天上午8时多才终止，会场基本稳定下来。上午10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广场上数百万革命群众同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欢呼声、口号声、歌唱声达5分钟之久。10时05分，北京市代市长吴德宣布庆祝大会开始，首先是林彪副主席讲话。这个讲话最大的亮点是指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实际上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后统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发表的国庆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就明确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接着是工农兵和革命学生代表讲话；随后是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讲话。11时15分结束。之后是从全国各地前来的数百万革命群众大游行，作为标兵的我们，最艰巨的任务由此开始执行。我们一直站在标兵点上让游行队伍从身边通过，持续两个多小时。下午2时许，第九列游行队伍走完，我和我系的几位同学凭借标兵证穿过一队又一队游行队伍，直取天安门广场金水桥旁。那里是人群最密集的地方，我们在极其拥挤的人流中，一边帮助维持秩序，一边等待毛主席出现——那个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城楼上的毛主席。从我们到金水桥旁至游行结束，毛主席先后四、五次出现在城楼上，向游行群众挥手致意，我们每一次都看得很清楚，每一次都拼尽全力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下午3时25分，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广场。最后一列高举红旗的队伍和十几万举花组字的学生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一拥而上，冲向金水桥旁。这时，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又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还走向城楼西区向群众招手，周总理挥动双手指挥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节日的欢腾气氛达到顶点。我们到近4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天安门广场回校。

10月6日晚，参加“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赤卫队、“八一红卫兵”联合在大教室举行的“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会”。根据林副主席国庆讲话和《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精神，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更大的高潮即将到来。回过头来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始，就是群众之间大分裂、大对立的开始，每一派都声称自己执行了革命路线、对方推行反动路线，矛盾越来越尖锐、对立越来越严重，谁都想争得有利地位、占领制高点，辩论解决不了问题，就诉诸武力。

10月14日晚，参加在北师大东大操场举行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首都各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数万人参加大会。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市委第二书记、代市长吴德，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建勋、雍文涛等出席。8时许大会开始，先让吴德表示态度，接着大会发言，师生们揭发、批判了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在前阶段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责令李雪峰交待。李雪峰向与会群众检查自己的错误，态度相当诚恳，但内容比较空洞，原则性的东西较多，具体事例很少，大家不满意，会场上责难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主持者令其再作准备，以便进一步检查。

10月22日，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用一版半的篇幅介绍大连海运学院的15个革命学生组成“长征红卫队”，步行两千里，从大连来到北京的事迹，并且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指出：“大串连，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连海运学院的革命学生，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10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陈伯达同志在人民日报社对北京市部分学生的讲话中又说道：“中央赞成步行串连。这不是简单的方式方法问题。步行，比坐火车、汽车，对你们的锻炼，对你们的将来，对你们的前途，都有更大好处。”“步行，有很大好处，可以经过千山万水，看到群众种种生活，听到群众语言、群众意见。可以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接近工农群众，使你们晓得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各种不同的意见都代表不同的社会思潮。你们就可以用脑子想一想，考虑，判断。电灯，有电源；过去点油灯，要有菜油，煤油，花生油。你们接触到许许多多意见，得到许许多多养料，将来就可以变成灯光。”在这些事例、社论、讲话的推动下，同学们纷纷筹划外出步行串连，动作快的已经走了出去；我和周围一些同学也在考虑这件事，且有了重走当年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道路的设想。

## 我当年写的回顾

10月28日—11月7日，撰写参加文化大革命半年来的回顾材料。全文如下：

##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错误及其教训

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机，我粗略审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自己的表现，颇有感触。现把这一时期所犯主要错误及其教训总结如下，以便日后引以为戒，免蹈覆辙。

### 一、盲目服从，稀里糊涂犯了许多错误。

1. 4月底—6月初，写文章批判“三家村”十分卖力，完全陷入黑帮分子设下的假批判、真包庇的圈套，不自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数次上当，走了很长一段弯路。5月底对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革命大字报很不理解，误认为北大出了“乱子”。

2. 6月1日—6月13日，对校党委的问题认识不清，一再受蒙蔽。开头不仅不写大字报揭发问题，还到处宣传我校党委与北大党委不同，是个彻底革命的党委，参与围攻给校党委贴大字报同学的行动，指责他们浑水摸鱼，是反党行为。这一阶段末期有所察觉，开始给孙泱贴大字报，但对校党委的其他成员，如崔耀先、赵德芳等人的问题仍认识不足；就是孙泱，也没有认识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咀脸，且认为即使孙泱是反党分子，校党委也不一定是坏的，充分信任校党委。

对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认识不清，前北京市委的问题暴露得比较充分，我意识到了；对前中宣部，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理智上都很难接受它是“阎王殿”的说法，直到6月10日晚参加全校党员大会、听了中央文件《一九六五年九月—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大事记》（文件揭露了中宣部大量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例，传达了毛主席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的指示和“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号召），才有所醒悟。

### 二、很不理解，站在文化大革命对立面。

6月14日—7月29日（工作组进校至北京新市委宣布撤消工作组），对毛主席亲自发

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怕”字当头：怕打乱旧秩序，扰乱安定的学习环境；怕搞错人，伤感情；怕出乱子，不好收拾……什么都怕，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怕革命，不自觉地置身于群众运动之外，指手划脚、泼冷水，有时甚至站到群众运动对面，反对和压制群众运动，成了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充分信任工作组，坚决执行工作组的指示，完全按工作组的要求行动，甚至比工作组的右倾路线还要右，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走到了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的反面，不自觉而又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1. 6月14日，当群众刚刚起来，校内稍有点革命气氛、开始有点“乱”（其实是正常的革命秩序）的时候，我就惊慌失措、恐惧万分，认为是右派出笼，闹翻天了，指责行动起来群众是“胡闹”、“瞎干一场”，根本不把它看成革命的群众运动。连忙与伍连连、张联瑜两同学跑到钓鱼台向中央文革小组“告急”，大肆渲染我校运动的阴暗面，要求中央立即派工作组来校领导运动。中午回到学校，听说工作组已经进校，顿时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一来可有救了，当晚即同伍连连一道找工作组反映情况。

2. 工作组进校初期，还来不及全面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校内的革命气氛尚浓，大字报成批成批地贴出来，从校党委到系党总支，直至班党支部、辅导员，揭出了许多问题。眼看校党委被冲垮了，许多人又起来冲击系党总支，准备把系党总支冲散；还有人起来冲击班党支部、辅导员，要把班党支部、辅导员冲掉……总之，群众起来了，要把一切旧秩序砸烂，搬走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建立全新的革命秩序。本来这是大好的事情，我却受不了，把大好革命形势看成一团糟，怀疑那些搬掉党委障碍物的人是右派分子，是乘机发泄阶级仇恨，想把我们的老干部都打成黑帮；断言我系党总支是革命的，谩骂那些要踢掉系党总支的人是跳梁小丑、想浑水摸鱼，准备同他们决一死战；指责那些冲击班党支部、辅导员的人是个人野心家，想捞取政治资本，是打着革命的旗号行个人报复、发泄私愤之实（不排除个别人如此，但把大多数群众都说成这样，就是错误的）等等，顽固维护旧秩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

3. 自己不积极写大字报揭发问题，还对别人写的大字报百般挑剔，指责人家揭发的材料不符合事实，怀疑人家别有用心。

4. 冷漠、消极对待各式各样的批判、斗争会，斗争校系领导人时没上台发过一次言，而对群众革命斗争中出现的一些小缺点、一些所谓“过份”的举动，如责问、训斥、站板凳、戴高帽等等，则评头品足，多方责难。

5. 工作组全面行使职权后，完全按照他们划定的框框行动，在工作组的指挥下跳舞，把工作组的领导等同于党的领导，绝对服从。要是有人背着工作组干点什么，就指责人家目无组织、不守纪律；要是有人怀疑工作组、批评工作组，就责难人家怀疑新市委、怀疑党中央；要是有人反对工作组，那就非给他扣上“反对党中央”的帽子不可。对于一些同学自发搞起来的责问会、斗争会，不仅不参加，还斥责人家违反政策。本来工作组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够右的，我却认为他们一些做法太左，比工作组的右倾路线还要右；偶尔也觉得工作组有些做法不大对头，但由于对他们充分信任，就没有再去想它，甚至没有提过任何意见。

6. 6月26日晚从一位同志处传抄来胡克实在6月下旬向中学工作队员作的报告记录稿。这本是一篇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黑指示，却被我们捧为经典，我和一些同学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个讲话稿，如获至宝，一致认为这一来我们的“方向更明确了”，“腰杆子更硬了”，那些乱蹦乱跳的“狗崽子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早晚要收拾他们。在胡克实黑指示的启发下，我们把一大批积极揭发问题的人都看成“假左派，真右派”（不排除个别人如此），或者是“中间派”、“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而把自己看作当然的左派，自鸣得意。

就在得到胡克实黑指示的第二天（6月27日），校工作组组长赵一平同志向全校师生员工传达了李雪峰同志6月23日的讲话。李雪峰同志这个讲话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集大成，与胡克实黑指示的精神完全一致，同我们正在自觉不自觉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度合拍，因此，我们一帮人非但没有察觉它有什么错误，还认为这是一篇高水平的讲话，

好得很，句句说到我们心坎上，听传达时欣喜若狂、眉飞色舞，报以最热烈的掌声。这个讲话更加坚定了我们的错误思想行为，听后就大讲特讲运动的阴暗面，大力宣传抓游鱼、抓右派，并且实际抓了起来——我与李金海、许寿明、张锡林、张联瑜、宋柱修、朱中仁、伍连连、陈剑英诸同学在相当长时间，夜以继日，用大量精力整理起×××的反党材料来，还计划整理×××、×××、×××等人的材料，准备在适当时候公布，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或右派学生（后因情况变化，众人只整了×××一人的材料，由宋柱修写成文，没有上交；李金海单独整了×××的材料交工作组）。我和张锡林、李金海还受工作组委派，在一段时间担负起观察×××动向的特殊任务。对于这几个人，我始终认为他们的为人做事不大地道，尤其是×××、×××二人，政治倾向、思想观点很成问题，在以后的适当时机、适当场合是应该加以揭露、批判的；但是在运动初始阶段，耗费那么多精力去整理他们的材料，准备把他们打成右派，则是错误的，就是不自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客观上起了转移斗争目标、压制群众运动的恶劣作用。

7. 保护工作组，不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维护者。

7月21日，北大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之风吹到我校，我顿时头脑发热，认为这是右派捣乱、反对党的领导的行为，与班里几位同学一道起草了一张大字报，抵制北大革命同学送来的大字报，指责人家是妄图煽动我们起来反对工作组，表示坚决拥护我校工作组的领导，谁反对工作组就同谁干到底。

7月23日以后，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同志几次到北大调查研究，主持关于工作组问题的大辩论。7月26日晚，我到北大大操场旁听了由江青同志主持的北大革命师生关于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执行什么路线、该不该赶走问题的万人辩论大会，争论激烈。末后，陈伯达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作结论，指出北大工作组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是阻碍革命运动的绊脚石，建议北京新市委撤走它。李雪峰同志代表新市委作检查，承认派工作组的做法是错误的，宣布市委决定尽快撤销北大工作组，并且要把市委派到各校的工作组全部撤回。

对这样一个急剧的变动，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我错误地领会了陈伯达同志讲话的精神，认为他说的是北大工作组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应该撤走，并没有说所有工作组都要不得，都要撤走，好的工作组还是可以留下的，不好的撤走后可以再派好的来。总之，工作组还是要的，只是不要坏的。这就从根本上抛弃了陈伯达同志讲话的精髓：撤走工作组，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从这个错误认识出发，我认为李雪峰同志宣布要撤走全部工作组的决定是草率的，没有经过慎重考虑。

陈伯达同志作的结论和李雪峰同志宣布的决定很快传遍我校。第二天，我校工作组就瘫痪了，再也支撑不住了。而革命的师生则被解放了，革命的烈火又熊熊燃烧了起来。大家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一两天内全校揪出数百个牛鬼蛇神和重点批判对象，斗的斗，批的批，戴高帽的戴高帽，游街的游街……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红色恐怖笼罩整个校园，牛鬼蛇神丧魂落魄，革命群众扬眉吐气。这本是一件大好事，是我校从未有过的大好革命形势，我却接受不了。对比此前相对安定的秩序，我认为当前的局面是“大乱”，近乎“胡闹”，一时看不懂这种惊天动地的革命创举。我把这种“乱子”归咎于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认为要是工作组还起作用，就不至于这样“乱”。我翻来复去地思考，还是归结到一条：工作组不该撤走，否则就无法搞革命，就体现不了党的领导。我想到千条理由万条道理，就是没有想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能够最彻底地解放自己、最有效地教育自己、最妥善地管理自己，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有党的领导，就有正确的方向、路线，就有最好的革命秩序。于是，我便轻率地提起笔来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企图陈述种种理由，要求把工作组留下来，领着我们闹革命。信写到一半，怎么也写不下去，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只得放下笔，回过头来再次学习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反复学习《红旗》杂志第9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经过一番学习，一番思索，一番斗争，才对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革命路线有所领悟，才打消了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挽留工作组的念头，才下决心投身革命群众运动，经受群众运动的洗礼和磨炼。但对工作组错误的性质仍没有足够的认识，一直认为像北大那样的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工作组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工作组还是好的，之所以要撤走，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学校工作，没法领导运动。至于对我校工作组所犯错误的性质，更是长期认识不清，在他们撤走时，我和我的同伴们是把他们当作较好的工作组欢送出校的；当听到、见到有些同志要求批判工作组、不让他们轻轻松松撤走时，我们是很不以为然的，指责人家有意刁难、居心不良。

认识派工作组是路线错误，那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识我校的工作组同样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应彻底批判，则是在10月1日林彪同志国庆讲话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以后。足见我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有多么深、执行得多么坚决、维护得多么顽固，几乎完全陷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

### 三、违背方向，死保头号当权派郭影秋。

6月13日中午，向青之流炮制的“把孙泱的后台大老板郭影秋揪出来”的大标语贴出后，我断定这是一条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新市委、华北局、党中央的反动标语。但开头觉得应该汲取前一阶段在孙泱、校党委问题上的教训，不要轻易表态，让人家贴去，看看究竟有多少材料再作判断；我还想，不管你郭影秋是什么人，只要发现你有错误，我就要揭，有多少揭多少，只是不给你胡乱扣帽子、随意下结论罢。别人可以贴大字报，郭影秋为什么不可以贴呢？因此，我还写了一张揭发郭影秋在1964年2月22日校团委召开的“重温毛主席号召，总结学习雷锋一周年收获大会”上讲话诬蔑“带着问题学习毛著，有时会导致实用主义”的大字报。本来，我的上述想法、做法是无可非议的，是符合文化大革命方向的；然而，当时校内的大多数人，包括周围的许多要好的同学都认为郭影秋同志是坚定的左派，而左派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现在不是整郭影秋同志的时候，谁企图整他，谁就是反对新市委、反对党中央，就是右派。大伙儿看到向青之流的那张大标语都很气愤，议论纷纷，一致认为应该反击。在这重大是非面前，我的动摇性、患得患失等弱点充分暴露了出来，没有经过多少思索就赞同大家的意见，撕掉了揭发郭影秋问题的大字报，跟众人一道高声赞扬郭影秋，并且从此心甘情愿地充当了郭影秋的“死保户”，铸

成一系列严重错误，在个人生命史上写下不光彩的一页。

1. “六一五”反革命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和忠实维护者。

6月14日晚，工作组贴出郭影秋的表态大字报，函授学院某些人当即贴出“郭影秋的大字报是个大阴谋”的标语和相应的大字报，激起工人们（校内各类工勤人员）的愤慨。6月15日上午，工人自发召集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会前发起签名运动，表达“誓死保卫革命左派郭影秋”的决心；会上斗争了反对郭影秋的5个人，喊出“反对郭影秋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誓死保卫革命左派郭影秋”，“誓死跟郭影秋同志站在一起”等口号，还四处寻找给郭影秋贴大字报的人。我是这次大会的积极参加者，不仅迫不及待地签了名（还替伍连连签上名），在会上振臂高呼上述口号（呼喊之前曾犹豫过，不知喊这样的口号妥不妥，但看到绝大多数人都起劲地喊，不喊的是极少数，且遭到周围人的白眼，便自觉地高呼了起来），坚决主张把反对郭影秋的人打成反革命，斗倒、斗臭，而且在会后参与斗争、审讯向青的大会，还为会上群众的激愤情绪所鼓舞，冲动地在我们宿舍（6处4排2号）门前贴出“那些攻击郭影秋同志是黑帮分子的跳梁小丑们，你们敢不敢把你们的材料公布出来？你们反对郭影秋同志，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你们是彻头彻尾的假革命、反革命！”的口号式大字报（宋柱修、杨绍竹一同签了名），指桑骂槐，把我班部分反对郭影秋的人打成反革命。我可谓“六一五”事件的干将！

“六一五”以后相当长时间，全校革命师生围绕“六一五”事件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大战若干回合，几经反复。不少同志指出“六一五”大会起了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的作用，是个全校性的反革命事件；也有相当部分同志认为“六一五”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好得很。我在这方面虽没作什么具体事情，却坚定地站在肯定“六一五”大会革命性的同志一边，与这些同志一道反驳否定这个大会的言论，以致连新市委代表武振生同志在6月16日工作组召开的全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对“六一五”大会作无关痛痒的批评都接受不了，立即与一位同学联名给中央文革小组写控告信，对武振生同志的批评提出反批评，肯定郭影秋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肯定“六一五”大会的革命性。此后还多次欢呼过赞

颂“六一五”大会的大字报，等等，一直不承认这个大会的反革命性质。

回头看，“六一五”大会确实是一个全校性的反革命事件，因为：第一，它保护的是我校头号当权派——第一副校长、党委书记，而他是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是这次运动揭发、批判的重点，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不该保的；第二，会上喊了许多带有严重政治错误、甚至反动的口号；第三，它斗争了好几个反对郭影秋的人，把一些主张揭发、批判郭影秋的人打成反革命（尽管这些人本身都有很多问题，有一些也是该斗的，但是在那样的场合、依据那样的理由斗他们，是错误的，客观上起了压制革命群众起来揭发、批判郭影秋以及其他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的消极作用，让牛鬼蛇神得到掩护自己的机会，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基于上述原因，不管这次会议是谁召集的，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有无幕后策划者，都起到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保护牛鬼蛇神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过关的坏作用，都应该看作全校性的反革命事件。无论我意识没意识到、承认不承认，我都是这起反革命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和忠实维护者，这是我对党对革命事业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

2. 参与为郭影秋评功摆好、阻碍革命师生大揭大批郭影秋的大合唱。我没写过这类大字报，但到工人、贫下中农中间作过调查，专门了解郭影秋的优点、功绩，并到处宣传、介绍他的优秀事迹，说服别人一起保护他。随着材料的积累（郭影秋确实有许多感人事迹），我越发坚定了当时的信念，越保越坚决。对歌颂郭影秋功德的大字报，大力支持、无比欣赏；对揭、批郭影秋错误的大字报则极其厌恶，或者完全不看，或者横加指责，从根本上反对人家揭发、批判。

3. 关于郭影秋问题的辩论，我始终站在“东生”中心联络组一边（虽然我不是其成员），确信郭影秋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数次参与围攻少数派的所谓“辩论”；热烈欢迎苏家坨的贫下中农来校参加辩论，希望他们多来一些，想以势压人，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对持不同观点的人非常反感，施加种种压力。

4. 上窜下跳，想方设法保护郭影秋。7月28日中午传来郭影秋与所谓“二月兵变”

有牵连的消息，当晚一部分同学到新市委揪郭影秋；我和李吉荣、杨秉文、张锡林、许寿明、宋柱修等同学紧随其后冒雨赶往新市委想问个究竟，在新市委接待站等了好几个小时。29日凌晨2时许得知郭影秋已被那一部分同学揪回学校，我们连忙起身返校，4时40分回到学校；在新饭厅由江春泽主持、上千人参加的斗争郭影秋的集会已进行了1个多小时。对部分人在没有弄清真相之时就肆意斗争郭影秋、喊出“打倒郭影秋”口号的行为大为不满。7月29日下午李雪峰同志在万人大会上宣布撤销郭影秋担任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我们甚为不解，当夜与许多同志一道骑自行车前往新市委，先后询问了陶鲁笏、马力、吴德等市委负责同志，一定要他们回答撤销郭影秋职务的具体原因，直闹到第二天下午才返校。此后又数次到市委、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希望向领导人反映对郭影秋的看法，报送为郭影秋评功摆好的材料。8月12日参与了坚守东风2楼、保护郭影秋（以免被反对派揪走）的事件。8月21日清晨陶铸同志在我校关于郭影秋问题的辩论会上指出，郭影秋不是黑帮，也不是左派，批评了我们一方的一些做法。我心生怨恨，当天下午与一些同学和工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要求中央首长接见，以控告陶铸同志模棱两可、是非不分的讲话。在那里呆了两天两夜，无果而返。

5. 对郭影秋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缺乏认识），很长时间认为他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应该加以保护，从而有意无意地打击了积极主张揭、批郭影秋的同志，压制了他们的革命行动。这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是我自运动开始以来一贯右倾、“保”字当头的集中反映。

附带提一下：在郭影秋同志问题上，我校大部分师生员工都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他们都像我一样，自己不揭发、批判郭影秋，还千方百计企图堵住别人的嘴，阻止别人揭发、批判郭影秋，把他当神物保护起来，谁动了他，谁就是反革命、就是右派。这就在客观上起了压制革命群众运动、保护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和牛鬼蛇神过关的坏作用；同时，由于郭影秋是我校头号当权派、党委司令官，与许多问题有牵连，他的盖子揭不开，校内其他问题的盖子就很难揭开，这就严重阻碍了我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这是对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

现在看来，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是：郭影秋是我校头号当权派，是这次运动炮轰、检验的重点，也是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盖子的头道关口。运动一开始就应该万炮齐轰郭影秋，揭开他本身阶级斗争的盖子以及与他有牵连的阶级斗争盖子，并循此前进，揭开整个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还可能有更大的盖子）。因此，运动兴起后，群众给他贴大字报，揭发、批判他，是完全正确的；而不主张给他贴大字报，不揭发、不批判（或暂时不这样做）则是错误的，反对给他贴大字报，阻挠群众揭发、批判他，是根本违背文化大革命方向的。在郭影秋尚未经过群众运动审查、检验，就把他调到北京新市委担负重要领导职务（直接领导全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可能是某些人策划的既包庇郭影秋又包庇我校党委的大阴谋；即使不是这样，也是错误的决策，它给了人大革命师生巨大的压力，阻碍他们去大胆怀疑郭影秋、揭批郭影秋，并循此揭发校党委的问题，阻碍了我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运动初期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是前者，就应当彻底揭露、深入追查，把主谋揪出来；即使不存在有意策划的阴谋，也应该严肃批评，引以为戒。

郭影秋本人的错误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归第几类，应该在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大揭大批、摆出全部确凿材料以后作结论。一开始就认定他是黑帮或左派，都是不妥当的。在证据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就把他当黑帮打，是不对的，一般说来是在大方向基本正确前提下的缺点、错误，是可以原谅的，但也不排除有少数别有用心者乘机捣乱；而在运动初始就宣布他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到处为他歌功颂德，用这顶帽子去封人家的口，也是错误的，是更大的错误，甚至是方向性的错误。毫无疑问，在郭影秋问题上存在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确有少数敌对分子兴风作浪，企图把水搅浑，以便自己逃脱。这是需要严加注意、高度警觉的，但不能把它看成运动的主流。

从目前揭出的材料看，郭影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犯有许多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又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更严重的错误，无论如何称不上左派，不是一、二类干部；但仅凭现有的材料，也不能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类的案定不了，他与党

的矛盾还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还不能把他当敌人打。当然，如果揭出新的包含更严重问题的材料，他的态度又极不老实，其矛盾的性质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

#### 四、敏锐性差，消极对待蓬勃兴起事物。

1. 对红卫兵组织的态度。“红卫兵”初现之时，我把它看成儿童团之类的组织，大不以为然，对其伟大历史作用毫无认识；又一度把它当成“贫协”一类的阶级组织（因为它只吸收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女，所谓“红五类”参加），而中央是不赞成在学校成立此类阶级组织的，因此也就不宜成立带着鲜明阶级组织色彩的“红卫兵”。此外，我还想，学校有党团组织，党团员分别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和团的组织生活，不应该参加其他组织；目前党团组织瘫痪，党团员没有了“家”、失去依靠，可建立一些战斗小组，以适应运动的需要，一旦党团组织恢复活动，就不能再有其他组织存在，“红卫兵”不可能是长久性的组织。干革命靠党组织领导，用不着搞什么红卫兵。由于有这种种考虑，我对“红卫兵”组织是不大热心的，虽然应几位同学之邀参加了筹备协商会，却一直犹豫不决、瞻前顾后，甚至觉得这种组织是非法的，不该参加。还有一个情况妨碍我对红卫兵组织持正确的认识、抱积极的态度：我校最早出现的红卫兵组织“人大红卫兵”建立初期形象不佳，严重脱离群众，加上它与我们持不同观点，我多方指责它，认为它是一个特殊阶层的组织，不仅不利于革命，还大有害于革命，表示决不参加这样的组织。直到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特别是电话请教老前辈、得到赞许的答复后，才决定加入。

2. 对大串连的态度。开头对大串连很反感，认为大批学生走南串北、东奔西跑打乱了革命秩序、破坏了校园环境，到处乱哄哄的，互相干扰，有碍运动的正常进行。因此，我连班与班、系与系之间的小串连都不积极，更谈不上大范围的串连了。足见我害怕群众、害怕革命运动达到何等程度。

## 五、自觉性低，犯了错误还迟迟未醒悟。

《红旗》杂志第11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人民日报》8月22日转载）精辟地论述了近几年来（特别是文化革命以来）党内严重尖锐的思想斗争，对我触动很大，使我对前一时期的错误有所醒悟，提出我们究竟站在哪一条路线上的问题，并不无痛心地向周围的同学坦言，我们应该做好在郭影秋问题上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思想准备。但由于缺乏闯劲、革命性不强，始终没有冷静地思考文化革命以来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彻底批判和清算前一时期的错误，以致于此后再犯再犯，直到10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还犹如站在十字路口，辨不清方向、下不了决心，使我在这一决定性战役中又打了败仗，处于极被动的地位。

以上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来我所犯的主要错误，其性质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害怕革命，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反对群众、反对革命。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指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19—320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在这里，毛主席给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画了一幅绝妙的肖像。对照我近半年来的行动，何其相似乃尔！

我之所以会犯这样一些严重错误，原因有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是缺少毛泽东思想，没有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熟悉、很不



理解，缺乏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终于走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陷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具体地说就是：

1. **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认识不清，对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毫无思想准备，充满迷茫困惑。**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严重性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和平演变”、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深刻透彻的认识。客观上事在必行，主席加以引导，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便蓬蓬勃勃地展开了，由此就产生了主席指导这场伟大斗争的战略战术。我对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似懂非懂，对阶级斗争的新特点一窍不通，“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从而对这场大革命的迫切性和深远意义认识不足，对这场大搏斗的到来准备不足，当大革命风暴刹时降临时，就晕头转向、摇摆不定，不知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尤其看不透那些挂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招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目，对这些所谓“共产党员”、“老干部”恨不起来，怎么也不相信他们是阶级敌人，深怕搞错了），更不知道采用什么办法来达到目的。一时间陷入重重迷雾之中，辨不清东西南北，以致于被阴险狡猾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骗再骗，走了一段又一段弯路、遭到一个又一个挫折。正如伟大导师毛主席指出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转引自《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这是个极为严重的教训。

2. **缺乏群众观点，害怕群众，站到革命群众运动对立面。**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主席从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出发，无限信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毛主席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林彪语，

载《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核心。主席最深刻地认识到，一切革命运动，没有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和积极投入都是不能成功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阶级敌人搞“和平演变”、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新形势下，非最充分地发动群众，采用大民主，即“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上）不能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挖出来、挖干净，不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这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最锋利最巧妙的战略战术。我对主席的这条革命路线很不理解，根本违背了主席的教导，背离了主席的立场。我没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不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不依靠群众的大多数，没有把能否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看作运动成败的关键，而把群众看成群氓、阿斗；不是热情支持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积极投身于革命群众运动之中，而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指手划脚、评头品足，说怪话、泼冷水，有时甚至站到群众运动的对面，压制群众运动，反对群众运动，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我相信的只是自己和自己身边的少数人，以及来自上级领导的所谓“指示”。我没有看清阶级斗争的新特点，缺乏无产阶级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在群众斗争的惊涛骇浪面前“怕”字当头，“保”字领先，经不起狂风暴雨的袭击，几乎被汹涌澎湃的波涛所吞没。我的群众观点等于零，革命闯劲等于零，勇敢精神等于零，终于不自觉地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当了可耻的守旧派，可悲的胆小鬼，难堪的可怜虫。这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羞愧。

**3. 不善于独立思考和判断，盲目服从上级，无条件贯彻领导意图。**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5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在这里，主席既阐明了一个重要的认识方法，就是对各种事物必须取分析研究的态度，辨别真伪、把握本质；又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

原则，就是不要盲从，不要提倡奴隶主义。怎样才能正确分析研究事物，辨别真伪、把握本质，而不盲从、不搞奴隶主义呢？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6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任何事物，只要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应用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去观察、分析，都是不难把握其本质，决定我们的处理办法，而不盲从、不搞奴隶主义的。可是我完全忘记了主席这一教导，我是最懒的思想懒汉，最庸俗的奴隶主义者，最不愿意动脑子，也最不善于动脑子，一味盲从，奉行奴隶主义，只要是“上头”来的“指示”，就不折不扣，坚决照办，不会也不敢提出疑义。我把基层党组织与党中央、毛主席完全等同起来，把任何一级党组织都看成党的体现，把任何一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都视为党的代表，必须绝对相信、绝对服从，不得怀疑，更不能反对，否则便是怀疑党、反对党。我只知道基层党组织与党中央有一致的一面，殊不知还有不一致的一面；我自以为只有像我这样“服服帖帖”，党组织说啥就是啥，才算得上对党有感情，拥护党、热爱党，是党的驯服工具，殊不知我的想法做法对党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思想行为不仅在上级党委是修正主义组织的情况下是要不得的，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种种损失，就是在上级党委是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好处的，不可能对党的事业起到推动作用，正如毛主席批评的那样：“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当然，在前一种情况下，恶果更甚。我身处修正主义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高教部领导的旧学校，处在史无前例的急风暴雨式的大变革中，在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都认不清形势、跟不上主席思想，对毛主席的彻底革命路线很不理解的情况下，不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深入分析，独立判断，而盲目相信上级指示，无条件服从上级领导，奉行奴隶主义，必然分辨不清真伪，把握不住本质，一再上当，屡犯错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越滑越远。这一重大教训，必须牢牢记住。现在我意识到，

组织观念是需要的，但更重要更根本的是要毛泽东思想；对任何组织、任何领导人下达的指示、命令，作出的决定、号召，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和审查，符合的就接受，不符合的则坚决抵制。组织观念是服从于毛泽东思想的，我们需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组织观念，而不是仆从式的唯命是从。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老前辈和亲朋好友。我信服的只能是毛泽东思想和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主张，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它出自何人之口，都不能接受，要坚决顶回去！

4. “私”字当头，患得患失严重，深怕失去拥有的种种好处。无私才能无畏。只有抛弃一切私心杂念、全心全意干革命的人，才最勇敢、最聪明、最能干，才能有最强的原则性和最坚定的革命性。我的闯劲之所以不足，革命意志之所以薄弱，有那么多“怕”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私心杂念太多，害怕失去一些东西。在半年多的革命实践中，我并非对所有问题都没有自己的看法，也不都是错的，仔细想来，还时有一些正确的、符合文化大革命方向的想法，但由于对个人得失考虑太多，顾虑重重，担心失去好同学，担心脱离大多数成为少数，担心被孤立遭围攻，担心跟一帮声誉不好的人站在一起、说同样的话、背黑锅，担心日后转不了正、丢掉党籍……等等，这一大堆个人打算终于使我丢弃脑子里一些正确的想法，附和错误的意见，并从言不由衷、勉强跟从，逐渐演变成为错误思想、错误行动的忠实辩护士；有时甚至为了某些个人目的（名誉、意气等）而自觉抵制正确意见、迎合错误思潮；有时提出一些正确意见，被周围的同学一说道，便不敢据理力争，连忙缩了回去……总之，我不是像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那样，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在众议纷纭的情况下，站稳立场，坚持正确的意见，捍卫正确的路线，当顶天立地的英雄汉，做“独立支持的大树”，而是拘泥于个人利益，随风飘摇，随大流、赶浪潮，背离大方向，抛弃革命原则，做了可悲可羞的软骨头，成了“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从我的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的状况看，我实际上是修正主义线上的人物，或者说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我从修正主义领导集团那里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什么名誉、地位、前途……

应有尽有。于是，我就把它看成最正确的领导、最优越的制度，并且误认为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我们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看不到它的缺失，更看不到它对真正革命派的压迫。从这种地位出发，我必然顽强地维护它，而竭力反对革命派起来造反。）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是我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突出表现，是需要充分注意、认真解决的。否则，发展下去就会在紧要关头动摇变节，成为可耻的叛徒。

回顾这个时期走过的路，我心中无比惭愧。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少损失（好在我不是运动的领导者，否则将造成更大的损失），这是我今后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要痛心疾首的事情，它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时时引以为戒。我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革命前辈，我这个共产党员太不够格了，像我这样的人怎配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呢？我愿意接受党和毛主席给予的任何处分。

我是在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再大的错误、再多的挫折都不能使我低头，我跟毛主席干革命是矢志不渝的。我虽犯有严重错误，但我知错认错，坚决改正。我一定彻底批判自己的一切错误思想行为，彻底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坚定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而贡献一切，誓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决心从现在起，紧紧追随毛主席，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永不回头，死不变心。

最后，用毛主席的一段话来结束全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待续）

1966.10.28—11.7

于中国人民大学

【口述】

## 右派许惠尔为何被打死

高放 口述

许惠尔不是教师，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的翻译，主要是翻译各种俄文资料。不过，这个人身体很壮。

五十年代，人民大学来了很多苏联专家，讲课需要翻译，他们还有很多著作，这些都需要有人译为中文，所以编译很需要。

我跟许惠尔不在一个单位，但是认识。那时候我住西郊校园，他也在西郊住。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大家很难看到各种小报，他很热心，跑到清华、北大、北航、地质学院采购各个单位自己出的小报，小报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各单位的问题。

他到各个单位采购，采购完回来在人大校园推销这些小报。我看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记得我也买过，一份三分钱、五分钱左右，一般没有超过一毛钱的。为了帮助大家选择内容，看看自己买不买，他就拿好几根绳子，在两棵树之间系个绳子，然后就把小报作为样本挂着，让你看看内容，想买就花三分钱，五分钱买一份，不想买可以不买，我也买过一些。

我看他的目的还是参加文化大革命，让很多学校的信息，大家花一两毛钱，不必再坐车或者骑车到别的学校买了，在校内就可以买的到，目的不是赚钱，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他并没有把价格抬得很高。后来过不久，他消失了，据说被打死了。怎么打死的，谁打死的都不晓得。

当时编译室倒是出了一件事情，可能是不是跟他有关联。编译室曾经奉上面什么人的指示，要编译室去编有关斯大林的材料。文化大革命来了，就有人揭发编译室是大反斯大林。还要追究编译室接受的是谁的指示和命令，有什么背景？谁叫这么做的？斯大林是伟大领袖，他虽然有错误，可专门收集他的材料，意图何在？

翻译这个事情可能许惠尔也参与了，而他还是摘帽右派，于是更是罪加一等。

我们系还有个教授叫黄少力，他是1958年才划成右派的，为什么1958年才划？就是因为北京市委发现，人民大学右派划的太少，比例不够，没有达到1.5%，所以人民大学在1958年秋后又补划一批右派，去凑1.5%的数，我们系就把黄少力老同志划成右派了。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所以就不能说黄少力是摘帽右派。

黄少力是顽固不化的右派，他不承认自己是右派。领导说你不承认，也还是要把你当右派处理。怎么处理呢？给你工资降三级，工作原来是教师，不能当教师了，就在资料室编资料。

后来到1970年，我们都下放劳动了，下放劳动以前，军宣队跟工宣队去找黄少力谈话：说你是1936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这么老的同志了，你不承认右派，你使党下不了台啊，党给你定的右派，你不承认右派，你是跟党对抗啊。现在你承认了是右派，我们马上给你摘帽，不用经过考验再给你摘帽。因为到1970年了，1956年到1970年过了14年了，你承认你是右派，马上就摘帽。

这个事挺有意思，我们教工就开了一个大会，要他做个检查就宣布给他摘帽。他说：“我不是右派，是军宣队跟工宣队给我说的，说我承认是右派就算我听党的话了，就给我摘帽。”他说：“那我就听军宣队跟工宣队的意见吧，我不跟党对抗，听党的话，党说我右派，我就是右派，其实我不是右派。”

最后他就过关了，给他摘帽了。大家找一个台阶下吧：你承认了马上就给你摘帽，你不承认没法给你摘。党不可能承认党有错误啊，党都是对的啊。你看，有这样滑稽的事情，然后他跟我们一起就下放劳动去了。

他1936年参加红军。他心态好，能想开，也不记恨，1979年右派都改了，他也不记恨，而且已经是五十好几的人了，居然还想念个博士学位。他1936年高中毕业，本来考上燕京大学了，结果自己非要参加革命，放弃了燕京大学上学的机会，跑到游击区，在灵寿县参加了红军。但是参加红军不久就不让他干了。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北平，他是北



京人，可能解放区生活比较艰苦，他就托家里人给他带一点什么东西，或者是穿的吃的比其他的人好。结果领导就怀疑他通敌，就不让他当红军了。不让他当红军以后，让他在两项工作当中选择一项，一个是马夫，一个是伙夫，他选择的马夫。后来成立了八路军以后人员要平等，说不叫伙夫，不叫马夫了，改个称号，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就改为饲养员，都是员，司令叫司令员，革命队伍里头一律平等，都是员工。

老黄还有枪伤，当八路军的时候的枪伤，所以他还是三级残废军人。1950年以后才到人民大学。我记得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一些老革命诉苦，说过去受日本人迫害，他诉苦，说他是三级残废军人，身体里还有一个子弹。

一直到共产党解放北平了，才了解清楚了他没有通敌行为。他1946年参加共产党。入党以后组织上相信他了，就派他回北平做地下工作。到了北平解放以后，地下党把他送到人民大学来学习，送到我们教研室，那时候我们教员很缺，一看资历这么老，1936年就参加红军，后来又是八路军干部，又受过枪伤，自己也肯学习，所以马上就把他留下来了，学习不到半年就当教员了，跟我们在一起。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右派。

据我了解许惠尔的情况，他曾经参加过某一派的活动，另外一派人就特别恨他，所以把他抓去。人民大学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比如党委宣传部长朱真。他错在参加了三红，他们夫妇都他参加了三红，所以新人大这边就特别恨他。朱真还参加了三红的一些活动，新人大的人更是对准了他。

我们系还有一个人也受罪，是普通的资料员叫张心绪。张心绪这个人也冤枉了一辈子。怎么冤枉了一辈子？他1950年是人民大学的学生，他学习比较优秀，把他选拔为逻辑学的研究生，学逻辑的，这是1951年的事情了。结果1951年夏天第一次审干的时候，他自己也糊里糊涂的，就交代说他中学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别人就问当过什么职务吧，他也糊里糊涂，可能讲当过一个分队长。

他自己以为说了没有什么，但这可不得了了，三青团的分队长，算上骨干了。所以1951

年镇反，马上就把他从研究生调到资料室当资料员。他也不错，埋头骨干，没有什么怨恨。调动的原因，组织上也没给他说明，只说现在资料工作很重要，缺个资料员，你就做吧。

结果文化大革命他参加新人大，又很积极活动，结果三红这边就恨死他了，就说他是三青团的骨干，把他抓去关起来毒打半天。

最有意思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重新审查，他根本没有参加过三青团，都说他是三青团分队长什么的，他自己交代的嘛，就相信了。后来他自己说他也不知道，当时组织上问他，因为他读的学校有三青团，就说大概参加过吧，问是什么职务，就说当时可能当过分队长，于是就成了反动党团骨干。

后来文化大革命重新查，真正去调查他的一些老朋友，查清楚他根本没有参加过三青团。到了人大复校以后，他因为在资料室干了一辈子，就给他当个资料室副主任什么的，后来调到出版社当一个编辑室主任，退下来了。现在还健在，比我还大两岁。■

【口述】

## 我是怎样被毒打的

高承宗 口述

抓我的时候，战报第一条是三青团骨干、第二条是假党员、第三条说我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黑手。

我老家是湖北恩施，1949年11月6号解放，1950年3月我参加工作时是恩施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还没毕业。我1952年在恩施专署机关时被吸收入党，那是刚解放不久第一批在专署地委机关发展的党员，只发展了6个，我是其中一个。一九五二年五月专署根据政务院部署抽调干部培养科技人才，恩施专区当时分配有10个名额，每县一个、专署两个，我被抽调出来，并指定我带队到省教育厅报到。在武昌补习了两个多月后，我8月份就被录取到人民大学专修科学习。在离开专署时我曾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党支部。那个时

候政治审查很严格，来人大以后，我又被指定为国内贸易班的学习班长。批准入党时间是1952年12月初，我已在人大，通过组织关系转过来，后来1953年在人大贸易系转正。1954年我被调到人大校长办公室工作。1955年全国人大第一届二次会议，从北京市的一些大单位抽人去大会做记录，人民大学抽一个，就把我抽去了。到人民代表大会去当记录，那个审查当然也是很严格的。这些档案上都有，我自己也不可能造假。

抓我的时间是1968年5月某天晚上11点左右。白天我还在上班。由一个女同学敲门，佯装找高老师，我已感到不妙，我一开门进来上十个人的样子，都拿着匕首，其中4个人主要是绑架拖我走。一进去就蒙住我的眼睛，用布塞到我嘴里，就将我拖到新人大总部四层。我的鞋掉了，脚趾刮出了血，他们找出了一双旧布鞋，让我踩着。其余的几个人抄我家，文件、相片盒拿走，抄家时不准我妻子、女儿下床。

抓去以后，先叫我听战报的时候，就扇耳光扇了好多次，那是个小伙子打的，而且是拼命扇，说竖起你的狗耳朵听战报。听战报就是那三条罪状。

后来再打大概是用铁锹把、皮鞭子、竹扁担之类的东西，后来又知道还有钢管头接的器械带、橡胶管子之类，从腰部一直到打到大腿一带，没有一点好肉，完全跟乌鸡一样。耳朵也打出血了。从夜里一直打到天亮，我脊椎骨有三节软组织被打断了。后来送到校医院去看，那个大夫我听声音知道是谁，姓陈。他讲了几句话，我还听得见。他说现在耳朵出血，这是耳膜破了还是里面的脑血管破了现在不好确定，反正这么流血是很危险。他的意思是说除非是想打死，你们这么打很危险。他讲到“除非”这里不让他讲了……大概大家都听懂了后面那个意思。所以我现在一个耳朵听得着，另一只耳朵一接电话就听不清楚。现在左眼已失明，耳朵也聋得厉害。

放出来以后人大三红的人就把我送到北医三院去看一下，大夫说打成这个样子，瘀血这么重，先吃点药看看，活血化瘀，三四天，一个礼拜，要能淡化，能吸收就算，要不能吸收就要从局部取出瘀血。当时我的身体比较好，家里不能住了，就住在留学生楼，住到工宣队、军宣队进校才搬回家。那时候也不可能住医院，因为被打的人很多，医院也不愿

意再接收这种人了，谁管呢，医院也在闹革命呢。

到五七干校的时候，后遗症有的时候发一发，重的时候起不了床，就休息几天，照样还要劳动。人民大学复校以后有时还发痛，有一次到教育部去开会，坐在沙发上就起不来了。副部长张文松说你怎么搞的，我说是文革中打的。2005年，正好是元月初四，吃完早饭以后还挺好，往沙发一坐下来就巨痛，碰到哪里都疼得不行了。到了医院，大夫说是原来的伤长的骨刺，骨刺正好戳到中枢神经，可不全身都疼了嘛，所以又动了手术。

当时打我的时候给蒙着眼睛，蒙着眼睛看不见人，打的人也不讲话。释放我之前，又审问了一下，但那次就没蒙眼睛了，从口音知道他就是头一天打我审问我的人。后来怎么确认就是他呢？是因为工宣队、军宣队来了以后在文化广场举行大联合会议，两边都有武斗队队长，这边新人大的武斗队长，就是当时打我审我的这位，就是他，但名字我不知道。

把我抓起来打完了以后，放在图书馆地下室躺着，看我的就是我们收发室的人，就是我领导下的收发员，全都认识。这几个人大部分如今都还在。有一个人比较好，叫张文启，当时收发室的组长。那天把我放到地下室以后，已经是早上，张文启问我吃不吃东西，他回家给我弄的棒子面粥。这还是位有人性的同志。

我心里明白，真正的策划者就是校部那几个人。要说平时我跟这些人没什么过节，为何对我下这样的毒手？就是因为有一次校务部总支某人要诬整某总支书记，当时我和另一位同志坚决反对，互相争吵了起来，于是某人就怀恨在心了。■

口述者 1952年开始在人民大学国内贸易专修班学习，毕业后留校，曾任校长办公室秘书、档案处处长。

## 【资料】

##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陆伟国 编写

编者说明：为了全面系统真实地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件和资料，我编写了这份“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它的主要来源是作者的大学时代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年出版；在网上连载的电子稿题目是“我那左倾狂潮下的大学生涯”），以及一些校友提供的资讯和他们在网上的文章。1970年以后的资料，有的是依据学校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纪事》的有关部分。

2016年12月写出初稿并在网上发表后，得到了母校老师、校友和各方人士的关注，提出了一些补充和指正。据此，写出了第二稿，希望能继续得到老师和朋友们的补充和指正，力求使人民大学这段特殊时期能有个更为完整、客观、系统的一个框架式的记录。

2017.10

### 一九六六年

5月4日-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5月23日，又决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阴谋集团”的处理，这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战役。

5月19日，中央改组北京市委。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郭影秋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兼原职）并代表华北局列席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在人大的职务仍然保留。学校日常工作由副校长孙泱主持。

5月24日，人民大学校内开始大量出现大字报，内容由批判“三家村”转向主要针对

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当晚，学校召开批判北京市委的大会。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

6月2日，郭影秋又被任命为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6月2日，在苏家坨前沙涧的哲学系11名学生最先贴出针对本校的大字报。因为远在郊外农村，当时校内并不知道。

6月4日，校内出现针对本校的第一张大字报，由经济系教师罗肇鸿所写，题目是“向我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开火”。

6月7日，哲学系教师姚中原贴出比较有影响的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

6月11日，共同政治理论课教师麦农等二十九名教工贴了副校长孙泱的大字报。

6月13日，北京市委宣布撤销孙泱的职务。上午10点，孙泱等人在文化广场上被批斗，这是人民大学召开对当权派的第一场大批判会。当晚，副校长崔耀先等校领导在教工食堂被批斗。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4日，函授学院的徐一志等五人贴了批判我校党委书记郭影秋的大字报，说他是孙泱的后台。

6月14日下午，新市委派驻人民大学的工作组进校，当天召开了动员大会。组长是海军副参谋长赵一萍，副组长是水产部副部长丛子明，另一位副组长是张伯瑜。

6月15日，徐一志等五人被保郭观点的群众拖出来在文化广场批斗。这是校内不同观点的对立，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公开化。

6月18日，全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

7月5日，校党委副书记赵德芳被大会批斗。

7月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我校李豫生等七位同学就要求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问题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7月22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美援朝大会。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

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等领导人参加。（本文提到的全市性大型活动，均有人大师生参加）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撤销工作组。

7月26日，北京大学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就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就此开始了“恐怖红八月”。

7月27日，在文化广场开了人民大学第一场由工作组主持的大规模批斗会。会后，对被批斗的领导、教授等五十余人进行了游街。

7月27日，康生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编造“二月兵变”的谣言，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

7月28日，各系也都开会批斗。当天下午，计划统计系在老俱乐部开批斗大会。王命先老师（王稼祥之子）会后去了京西运河投河自尽。第二天，尸体被发现。他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的第一批罹难者。

7月28日夜里，郭影秋被造反派揪回学校。过了零点，又被拖到新饭厅批斗。会后，郭被押到东风三楼法律系宿舍的底层。保郭观点的人聚集在楼前，迫使对方放出郭影秋，便又把他转移到了法律系旁边的那个楼——东风二楼2层28号，农经系的宿舍。这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不同观点的群众第一次比较激烈的直接对抗。

7月29日上午，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陶鲁笏到校，在文化广场群众大会上讲话。

7月29日下午，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开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均到场讲话。会上宣布撤出工作组，并撤销了郭影秋刚担任二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和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资格。



当晚和次日人民大学部分群众去市委和康生处，就罢免郭影秋问题讨要说法。

8月2日夜，中央在人民大学举行就郭影秋问题的大辩论会。大会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德主持。在北京参加中央全会的许多领导也参加了这个大会。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了总结发言，说“‘二月兵变’没有那回事。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并讲了那句有名的话：“文化大革命我也不理解，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8月5日，毛泽东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

8月5日，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本校的女红卫兵活活打死，开了北京市打死人的先例。

8月6日，校内成立东昇联络组，推举老职工李文华担任组长。这应该是全市相当早的在学生之外的一个群众组织。

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

8月8日，人民大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成立。主任余景清，副主任李豫生、江春泽。该机构到10月就解散了。

8月8日，人民大学的朱佳木等十几个高干子女，在刘平凡的家里成立了“人大红卫兵”。

8月11日夜，人大红卫兵贴出“严正声明”，表态批判郭影秋。

8月12日，校文革筹委会说人大红卫兵将纠集5000红卫兵来斗郭影秋，结果大批保郭观点的职工、学生把东风二楼（将郭保护起来的暂住地）团团围了起来，加以守护。开始了两派“武装割据”的苗头。

8月13日，中央台广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全校师生当即去校外庆祝游行。

8月14日晚，邓小平、陶铸接见校文革筹委会成员。

8月17日，陶铸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大红卫兵的代表。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身

穿军装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吴玉章校长和人大的两派代表也都上了城楼。

毛泽东先后八次共接见 1100 万红卫兵，人大两派红卫兵数次参加维持秩序。最后一次是 11 月 26 日，毛泽东改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

8 月 20 日，苏家坨六百多名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还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郭影秋在东风二楼楼上的窗前，向他们作了简短讲话，要他们尽快回去。他们的代表也参加了当晚的大辩论会。

8 月 20 日，“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东升联络组”的基础上，在张联瑜等同学的组织下宣告成立，持保护郭影秋的态度。

8 月 20 日晚，中央再次在人民大学就郭影秋问题召开大辩论会。陶铸出面上台讲话。

8 月 24 日晚，传来消息说，“中央文革”赞同北京的学生出去闹革命，北京的学生就此蜂拥而出，大串联开始。

8 月 26 日，人大学生参加在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大规模游行。

8 月 27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简称“一司”）。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大串联的通知《关于组织外地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9 月 5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简称“二司”）。

9 月 6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简称“三司”）。上述三个组织的主要成员中都有人大的学生参加。

9 月 7 日，毛泽东在山东王效禹写的报告上作批示：“中国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9 月 7 日，鉴于外地来京学生暴满，周恩来特地来人民大学，在大操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动员外地滞留学生尽快离京。

9 月 7 日，俄语老师阚玉瑶因其妻林莉（林彪的侄女）被江青指为苏修特务，而在宿舍

上吊自杀。

9月20日，另一部分学生以“八一二串联会”为主，在新教学楼二楼聚会，把已经名存实亡的“人大红卫兵”接了过来，成了“人大红卫兵”的主体。会上推举曾国乱同学为司令。

10月9日-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基层党组织就此停止活动，各级党委陷于瘫痪。

10月12日，“八一八”批判郭影秋。“人大红卫兵”进场干扰。两派群众组织公开冲突。

10月22日，为减轻大串联对交通造成的压力，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提倡步行串联。人大学生步行串联的主要方向是经大寨去延安。

12月12日，吴玉章校长病逝于北京医院。14日，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追悼会。

1966年底，红卫军等一些零星组织或融入人大红卫兵，或纳入另搞起来的一个“东方红公社”。人大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公社，这三个组织习惯上又统称为“人大三红”，召集人为孔宪龙同学、刘庆库同学和安维华老师，没有明确的成立日期。

## 一九六七年

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对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不要以为打倒刘邓陶就完了，还有呢。”“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他还说：“孙泱是蓝衣社特务”。

1月，北京街头出现“打倒朱德”的大字报，“人大三红”有人参与。

2月22日，原“八·一八红卫兵”的力量改组成“新人大公社”，负责人为赵桂林、张祖义同学。

2月，住东风一、二、三楼的“新人大”同学撤往图书馆楼（“新人大”总部）和北

五楼等处居住。两派在校内双方对垒的“武装割据”局面形成。

3月3日，戚本禹来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

3月4日，“人大三红”部分人就此而成立了“揪朱（德）联络站”，月底撤销。

3月10日，前往曾经的“联动”的窝——海淀镇西面的八一学校，参观“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

3月20日下午，为反击“二月逆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击溃谭震林复辟资本主义逆流”的大会。（本文提到的全市性活动均有人大师生参加，下同。反击“二月逆流”，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而打倒刘邓陶，则被称为是第二战役。）

4月10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十几万人的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4月16日，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来人大，表态支持“三红”，并为“人大三红”题字。其中红字还多了一点，写成了错别字。

4月27日上午，在北大召开批斗彭真的大会。

5月5日，“三红”召开大会批斗高层走资派，“新人大”试图冲击。双方已集结队伍，后“新人大”退出，一场武斗得以避免。

5月8日，文化广场上，两派群众有小冲突。

5月15日，首都红代会、工代会举行反对武斗的大游行。校内紧张空气稍有缓和。

6月8日、6月13日，校内两次大会批斗孙泱。

6月11日，“新人大”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等在校内联合批斗聂真（聂真是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人民大学副校长）

6月15日，大会批斗郭影秋。这几次批斗，两派名为联合实为暗斗。

6月26日下午，三军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罗瑞卿大会。

7月10日，两派联合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7月13日开始，由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发起，全市数千群众组织以围困中南

海的方式要挟中央交出刘少奇任由群众批斗，在府右街组成所谓“揪刘火线”。“新人大”和“人大三红”都有参与。

7月17日，中南海西门外召开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

7月20日，爆发武汉七二〇事件。

7月21日下午，“三红”上街游行，并有几百人到永定门车站捕捉想要来京游行上访的所谓“百匪”（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狮”）。

7月22日，“三红”部分成员去西郊玉泉山宾馆抓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未得逞。

7月24日，在北京矿业学院召开批斗陶铸大会。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回北京。

8月3日，“三红”的大队伍去“揪刘火线”游行示威。

8月4日，北京高校部分群众在机场批斗、殴打要撤回国的日本共产党驻中国代表和日共中央《赤旗报》驻北京记者（砂间一良和绀野纯一）。“人大三红”部分人员起了主要作用。

8月5日，为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声讨刘邓陶的大规模集会。

8月10日，由于武汉事件的影响，围困中南海的群众基本撤离。

8月21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彭德怀大会。

8月22日晚10点40分，数千群众冲砸、火烧英国代办处。“新人大”人员有参与。两、三天后，“三红”也去了那儿示威游行。

8月26日，在人大校内，由“新人大”联合校外几个单位，批斗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聂真（原人大副校长）。

9月4日、16日，江青连续表态支持“三红”打倒肖前（我校哲学系副主任）。

9月16日，康生点名孙泱是“大特务”，并说中国人民大学特务多。

9月26日，陈伯达、江青在外校群众大会上再次讲孙泱是“大特务”。之后，两派都

对学校主要领导进行了批斗和毒打。

10月6日，孙泱被害死在“新人大”关押的图书馆楼地下室。据说，有个“上吊自杀”的现场。

10月6日，“新人大”从林园4楼17号的家中抓走朱真，关到图书馆楼地下室。

11月4日，听说“新人大”要进攻“三红”总部所在的新教学楼。“三红”连夜作准备，搬砖头堵窗口。

11月12日，“新人大”抓走“三红”的王昆顺，开始了双方相互抓捕对方成员的先例。

11月25日，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亲自来校主持双方达成七条协议，并召开大会，作了要求制止武斗的讲话。

11月？日，两派组织在大教室举行交换双方被扣押人员的仪式。

12月，“新人大”释放朱真，由“三红”“保护”在他们的总部新教学楼。

## 一九六八年

2月5日，北京市革委举办“北京高校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

2月20日，“军训团”进校，还在文化广场搞了个欢迎仪式。

3月3日晚，“三红”在戚本禹来校一周年之际举办“庆祝打倒王关戚文艺晚会”，以示划清界限。

3月16日下午，“三红”有人贴出“打到变色龙谢富治”的大字报。

3月22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驻京团以上军队干部万人大会，由周恩来主持，林彪宣布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次日晨，毛泽东到场讲话。此事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五战役”。“第四战役”则是指打倒王关戚。

3月27日下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权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

3月29日，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伤数百人，开始了北京高校校内武斗的又一轮高潮。

4月7日，新闻系蒋荫恩教授在被“三红”关押的南一楼15号上吊自尽。

4月14日，法律系何思敬教授被新人大“学工农”战斗队关押在北二楼，打成脑出血，死于积水潭医院，终年72岁。

4月16日晚，“新人大”打伤“三红”一名女同学。双方大喇叭激烈对骂，紧张气氛迅速加剧。

4月29日，思想解放的先驱者、新闻系资料室管理员林昭烈士被枪杀于上海龙华刑场。

4月29日，各校群众组织头头的学习班草草收场。

5月7日，计划统计系教授吴景超教授，因受极左路线迫害不幸逝世，终年68岁。

5月10日，驻校“军训团”面对失控局面无能为力，突然撤走。

5月10日，“新人大”在“军训团”撤走后，立即占据教工家属宿舍的林园楼。有11户“三红”教师的家被抄和赶走，并抓走部分“三红”教工。

5月11日，人民大学爆发第一场双方冲突的大规模武斗，由“三红”攻打“新人大”占据的红楼。后“新人大”撤出，“三红”进驻红楼，未造成死亡。

5月15日夜，“三红”向校办工厂发起突然袭击。中文系的“新人大”王锡中同学不幸被刺中劲动脉当场身亡。

5月17日下午，“三红”捣毁可能被对方用于埋伏的位于主干道北侧的体育用品房。

5月22日下午，一场空前的血腥武斗在图书馆西南的空地爆发。“新人大”方面陈荣祖（计划统计系）、廖金妹（农经系）、杨大志（农经系）三位同学当场身亡。还有部分受重伤的同学在事后因此而去世。如经济系的沈士根同学被刺瞎眼睛，于1970年去世。

5月23日，“新人大”方面为死难同学举行追悼大会。王锡中同学父亲作为死难者家属代表发言。

7月1日晚，“新人大”捣毁“三红”的部分工事。

7月2日凌晨，“三红”方面回击，去捣毁“新人大”工事。结果“新人大”方面扔出了个手榴弹，并有枪声。人大校内武斗也用上了热兵器，幸未发生大的伤亡。

7月10日，周恩来就何思敬、吴景超死亡事件，给公安部长谢富治写批示。

7月27日，数万名工宣队员在解放军的配合下，未作说明，突然开进清华大学占据校园，与学生发生冲突。工宣队员死五人。

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亲自出面，召见了北京高校的“五大领袖”。他在讲话中两处提到了人民大学，一是说“‘人大三红’反谢富治，总部不出面，叫一个小小的战斗队出来”；二是说“我看赵桂林不是反革命么”。（赵，“新人大”的负责人）

8月22日，以人民机械厂为主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人民大学，开始进行“大联合”。

8月底，“新人大”学生回东风楼、南五楼等原宿舍，“三红”教工回林园等原宿舍。

9月初，66、67届毕业生离校。

10月21日，工宣队、军宣队召开全校大会，号召为建立校革委会努力。

10月26日，召开批判朱真大会。朱真是党委宣传部长。

11月15日，召开批判肖前大会。肖前是哲学系副主任。

11月23日，工宣队中的人民机械厂职工换成北京橡胶总厂的。

11月到1969年5月，清理阶级队伍。在全校各系批斗了许多领导和教师。

12月18日，召开全校清理阶级队伍的“宽严大会”，对“顽固不化”的典型卞占魁进行批斗。

12月，1968届毕业生离校。

## 一九六九年

1月8日，北京橡胶总厂对其工宣队成员进行厂内轮换。

1月31日，再次召开清理阶级队伍的“宽严大会”。对“坦白、认识较好”的计划统



计系一年级学生陈仓仓，公安部门当场教育释放。对“顽固不化”的该系五年级学生范秀济，公安部门宣布，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押回原籍交群众专政。

2月6日下午，召开“清理阶级队伍，进一步体现党的政策”全校大会。由郭子诚、陆大壮、董代耕三位教工交代问题。

2月28日，召开全校“专案工作经验交流会”。

3月2日，发生珍宝岛事件。3日起，连续十多天，全校师生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前游行示威。

3月26日，军宣队召开有关该事件的全校大会。

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当晚和次日，全校师生去天安门游行庆祝。

4月14日晚，中央台广播：在毛泽东主持下，“九大”通过了新党章和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全校师生去长安街游行庆祝。

4月24日，“九大”闭幕，产生党中央新的领导班子。当晚，全校进行庆祝集会。

4月25日，全校师生又去天安门游行庆祝。

4月27日晚，中央台全文广播了在“九大”开幕式上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全校举行校内庆祝集会，会后又游行。

5月7日上午，开会批斗了一个喀麦隆留学生韦拉德吉。

5月14日，召开全校“落实干部政策大会”。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9月24日，成立由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宣队的杨培基，副主任有崔耀先等。

9月28日，召开校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副司令员李钟奇、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等出席。

10月10日上午，全校召开“掀起整党新高潮”大会。

10月20日，全校召开“防空战备动员”大会。

10月25日上午，全校召开“加强战备，走出校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大会。

10月28日，依据“一号命令”，历史系等十一个单位到苏家坨公社劳动，计划统计系等六个单位到东方红炼油厂劳动。

11月1日，运动中的运动“整党运动”基本结束，基层支部逐渐开始恢复组织生活。

11月，在“整党运动”基本结束后又进行“整团活动”，历时大体一个月。

11月7日，成立江西省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后改称五七学校）。

11月16日，历史系教授何干之因受极左势力迫害，致使心脏病复发逝世，终年64岁。

11月27日，第一批教职工528人去余江干校。

11月，在苏家坨公社的历史系等11个单位的师生转移到第二毛纺厂等8个工地劳动。

## 一九七零年

1月3日，开始“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批清运动”，历时二年多。

这两年中，有不少两派组织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江西“五七干校”被隔离审查，最后没有查出一个“五一六分子”。但目前所知，在江西“五七干校”，至少有项冲老师（服毒自杀）、陈秋梅老师（割刀片自杀）、李尚公（用烧红的铁条直刺心脏自杀）和总务处会计杨树贵（自己扑向电锯、劈脑袋自杀）被迫害致死。

意外死亡还不在于内，如计统系总支书记铁华为救溺水的妻子而自己身亡。

5月18日，开始“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即“一打三反”运动。

7月9日，学校召开“应届毕业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布置毕业离校工作。

7月28日，在大教室宣布全体毕业生（69、70两届）的毕业分配方案。

8月，在校学生全部离校。

10月23日，原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冤死狱中。

10月，中国人民大学停办。

1970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第二炮兵（102部队）迁入人民大学校区。

### 一九七一年

1月，第一批近600名教职工被分配到北大、清华、北京市革委等单位。

### 一九七二年

5月14日-12月日，人民大学余江“五七学校”撤销，教职工分批回北京。在“五七学校”开办三年中，先后有1583名教职工、480户家庭分8批去到那儿。

### 一九七三年

6月，第二批1420名教职工按建制成块分配到北大、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单位，另有160位教职工回家家庭所在地工作。

8月29日，北京市规划局将林园东侧8000平方米批给大华衬衫厂使用。

10月10日，北京市委、市革委通知，撤销中共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小组和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委员会。军宣队全部撤离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告结束。

1973年，始终未被改正的著名学生右派、人大校友林希翎（程海果）女士，由于毛泽东的过问，在刑期将满之时被提前几个月释放。

### 一九七五年

4月4日，人大校友张志新烈士在辽宁盘锦监狱被割喉杀害。

\*\*\*

\*\*\*

\*\*\*

\*\*\*

文革结 1978 年束以后，7 月，中国人民大学恢复，成仿吾任校长。

7 月 11 日下午，学校召开恢复大会。

7 月 26 日，举行全校会师大会。

9 月 29 日，成立校党委，成仿吾、郭影秋分别任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

### 编者简介

陆伟国，1945 年生，上海市人，1962 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获得过省部级优秀教学奖、科技进步奖、优秀社科成果奖，负责过一份经济类核心期刊。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个人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 年）和 140 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1949-1989）》（香港时代出版社，2015 年）。电子邮箱：luweiguol900@sina.com



### 【本刊声明】

##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行